

恩 福

BLESSINGS

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路加福音9:23)



回首溫州建教史 P.2

Looking Back on the Church History in Wenzhou

解析文化與圖騰——兼談“羊文化”成立嗎？ P.7

An Analysis of Culture and Totem:

Is the Phraseology of Sheep Culture Valid?

向上之民 P.11

The Up - Going People

奇特的榮耀——潘霍華的一生（下） P.25

Strange Glory: A Life of Dietrich Bonhoeffer (I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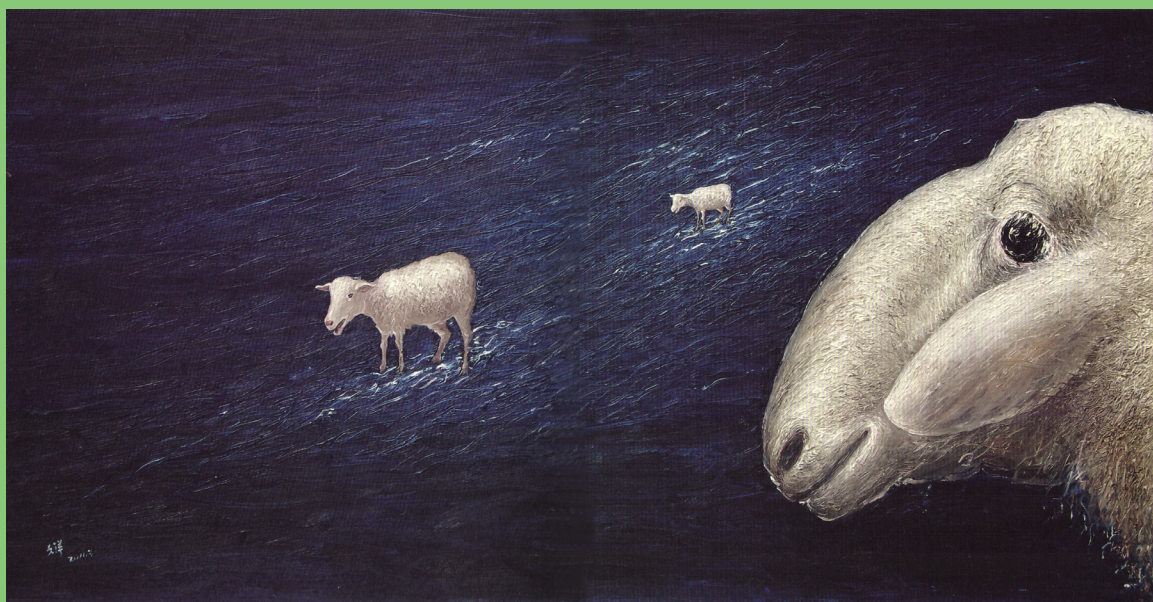


(夏訓智畫)

主耶和華說，我必親自作我羊的牧人，使他們得以躺臥。失喪的，我必尋找；被逐的，我必領回；受傷的，我必纏裹；有病的，我必醫治。(以西結書34:15-16)



(朱久洋畫)



(朱久洋畫)

目錄 Contents

時代話題 *Current Issues*

- 回首溫州建教史
之一：從蘇慧廉看文化宣教
之二：望溫州思全球——《中國的耶路撒冷-溫州基督教歷史》序 2
Looking Back on the Church History in Wenzhou
(I) William E. Soothill: A Perspective from Cultural Mission
(II) Preface to *China's Jerusalem, Wenzhou Church History: A Global View from Wenzhou* 陳宗清
- 解析文化與圖騰
——兼談“羊文化”成立嗎？ 7
An Analysis of Culture and Totem:
Is the Phraseology of Sheep Culture Valid? 李靈
- 新絲綢路與宣教願景 封底
New Silk Road and the Vision of Mission 蘇卿

新視野 *New Perspectives*

- 向上之民 11
The Up-Going People 吳家望
- 基督教與法治的發展 15
Christiani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Juridical System 周鐵樓
- 後現代氛圍下看神學與教牧 18
Theology and Pastoral Ministry in the Postmodern Age 莊祖鯤
- 阿奎那的宇宙論及其現代意義 23
Aquinas' Cosmology and Its Modern Implication 葛擁華
- 奇特的榮耀（下）—潘霍華的一生 25
Strange Glory (II):
A Life of Dietrich Bonhoeffer 劉良淑摘譯

報導與見證 *Events & Testimony*

- 我所羨慕的服事 31
What I Admire in Serving the Lord 劉陽

恩福

Blessings, Vol. 15, No. 3, July, 2015

Published quarterly by Blessings Cultural Mission Fellowship

2015年7月 第十五卷第三期 總56

出版者：恩福文化宣教使團

ISSN# 1543-0936

President/Chief Editor: Grant Chen
Managing Editor: Liang-Shwu Chen
Editor: Jasmine Jing Zhang
Cover Designer: Shan Zhou
Administrator: Sharon Lin

會長／主編 陳宗清
執行編輯 劉良淑
編輯 張靜
封面設計 周珊
行政 林雪騰

本刊有作者署名之文章，文責作者自負，立場不代表本刊。
本刊保留文章版權，歡迎轉載，請先來信通知。

本刊自由索閱，建議奉獻：\$15（一年四期）

索閱單請影印本期第22頁

奉獻支票請寫：BCMF

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U.S.A.

Tel/Fax: (949) 556-3033

E-mail: enfu@bf21.org

Website: www.bf21.org

本刊文本只在美國與台灣發行

台北代理：致福感恩文教基金會 黃暄筑 T:8780-1011*204

其他地區請利用恩福網站觀看，不便之處請見諒

<http://www.bf21.org/magazine/magazinehome.htm>

恩福文化宣教使團 BCMF

異象 推動文化宣教 耕耘華人心田

信仰 本使團篤信聖經為真神啓示，原稿毫無錯誤，是信仰與生活最高的準則，並接受早期教會信經以及近日福音派的信仰告白。

董事 陳宗清（主席）、陳惠琬（書記）、許蒙惠（財務）、駱傑雄、蘇文峰、陳永昌、蕭隆昌、陳愛光、張文辛、陳政、蕭康

Our Vision: Ploughing the Field of Chinese Culture
Preparing Hearts for the Gospel

Our Confession:

We accept the Bible as the inerrant revelation of God, guiding faith and living. We also accept the creeds of the early churches and the evangelical confessio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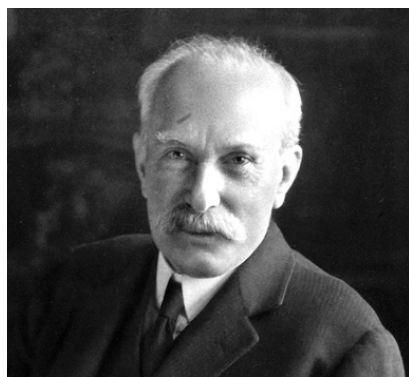
回首溫州建教史

陳宗清

之一：從蘇慧廉看文化宣教

今年對華人教會來說，意義非凡，因為150年前的6月，戴德生在英國倫敦創立了中國內地會。這個差會（後改名「海外基督使團」）過去一個半世紀有效地被神使用，至今仍有一千四百多位宣教士，在東南亞各國及創啓地區服事主。另外，台灣的教會在今年也紀念設教150年，因為長老會的宣教士馬雅各（James Laidlaw Maxwell）於1865年抵台，展開醫療宣教的生涯。

本文探討的宣教士蘇慧廉（Williams Edward Soothill, 1861-1935），並不隸屬於以上兩個差會，而是由英國



偕我會（United Methodist Free Church, 後譯循理會或衛理公會）差遣，1883年1月12日抵達溫州。他在中國一直待到1918年，在這三十五年對華宣教的歷史上，樹立了多方面的典範。

由於《恩福雜誌》重視文化宣教的研究，所以本文從這一角度來闡述蘇慧廉對今日宣教的意義。他一生的行徑和成就帶給我們很多寶貴的啟發。

從宣教到漢學大師

1998年我攻讀博士學位時，要涉獵有關中國歷史與哲學的書，因此有機會對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作深入的瞭解。我的書架上仍擺著他撰寫的《中國：一部新歷史》（*China: A New History*）。熟悉近代史的人都知道，在二十世紀下半葉的中美關係中，這位「中國通」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費正清於1929年從哈佛赴英潛修中國史，他在牛津大學就讀，指導教授便是蘇慧廉。可見，費正清對中國的解讀必然深受蘇氏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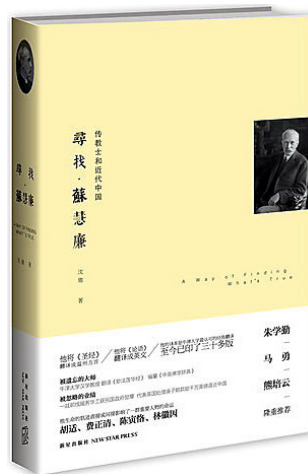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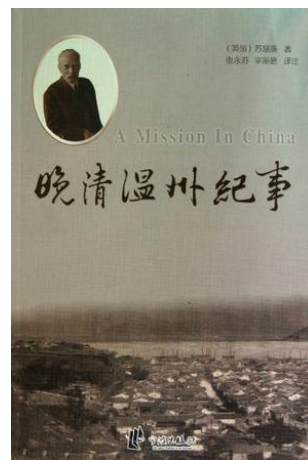
蘇慧廉在1907年所寫有關他在溫州事奉的書，一百多年後竟然還被寧波出版社翻譯成中文，取名



1926年蘇慧廉重回中國時，結識胡適，後來常有交往。圖為蘇氏（中立）與胡適合影。

《晚清溫州紀事》（*A Mission in China*）。《尋找，蘇慧廉》一書，是作者沈迦花了六年工夫收集資料寫成的，2013年出版後佳評如潮，甚至得到鳳凰衛視的看重，在「我的中國心」節目中特別予以介紹。

這位出生在英格蘭哈利法克斯（Halifax）小城一個紡織工人家中的男孩，以卓越的語言天賦、堅毅不拔的精神，執著於神對他的托付，在溫州宣教史上寫下輝煌的一頁。他採取內地會戴德生的路線，認同中國人的生活；除了傳教，還設立戒煙所、創辦學堂。經過二十餘年的辛勤耕耘，溫州的信徒增至萬餘人，設立了9個聯區，共有



經過二十餘年的辛勤耕耘，溫州的信徒增至萬餘人，設立了9個聯區，共有270餘分堂。 After his laborious work in Wenzhou for twenty more years, the number of believers reached over ten thousand with around 270 churches in 9 districts.

270餘分堂。

最特別的是，他秉承天主教耶穌會教士利瑪竇對中國古代經典的愛好，又受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的影響，鑽研漢學不斷。他勤奮不懈，用拉丁文編寫《溫州土語初學》，用羅馬拼音完成溫州話聖經，並寫《四千常用漢字學生袖珍字典》，幫助不少宣教士學習中文。他不僅研究漢學，還對佛教深入研究，從梵文編寫佛教辭典。

因著他在學術上的成就，1920年牛津大學聘請他擔任漢學教授，促進中西文化的交流。

動力是基督的愛

從倫敦大學畢業後，蘇慧廉毅然決然獻身宣教事工，甘願到當時十分落後的非洲或亞洲去事奉。由於所屬宗派在溫州的負責人李華慶（Robert Inkermann Exley, 1855-1881）突然過世，他被緊急調到那裡去。為此，他放棄了修習神學的機會；這樣的選擇完全是因著基督的愛。

從踏上中國土地的那一天，一直到神差派他回英國，他在宣教工場面對無數的困難與險阻，而他無一不是靠著神的恩典度過。無論是建立教會、辦醫院或開設學堂，基督的愛永遠是激勵他不斷往前最重要的動力。



蘇氏在溫州主持建造的城西堂

我們都熟悉戴德生的名言，他在1860年2月14日寫給新婚大妹的信中說：「假使我有千磅英金，中國可以全部支取；假使我有千條性命，絕不留下一條不給中國；不，不是中國，乃是基督。這樣的救主，我們為祂所作的會嫌太多嗎？」戴氏清楚表明，基督的愛乃是他為中國犧牲的最重要因素。對蘇慧廉而言，他對中國所作的一切奉獻，也完全來自基督的愛。

蘇慧廉曾在曼徹斯特當過律師。有一天在雜誌上讀到一則循道公會招募志願者的啓示，決定到這個窮鄉僻壤傳福音。1885年元月，他的妻子蘇路熙（Lucy Soothill）也來到溫州，共擔使命。他們在溫州紮下根，生子育女，一待就是二十五年。

看重學術與教育的策略

文化宣教有一條不變的法則：無論任何領域，宣教士首先要贏得人們的尊重，而這樣的尊重是建立在他在該領域卓越的表現上。

要在宣教工場上建立恆久穩固的信仰基石，就必須改變當地文化的世界觀。耶穌說，祂就是真理（約翰福音14:6）；正規的學術研究能幫助人摒除錯謬，認識「真實」，結果必定使人對真理更加敞開，以致改變世界觀，更接近聖經的觀點。因此，學術與教育是文化宣教不可或缺的途徑。

蘇慧廉在溫州開設教會的同時，也建立學校，取名為「藝文書院」，後又創立「藝文女校」和「藝文學堂」，使當地的子弟從錯誤的世界觀中得到解放，並接受立基於聖經的現代知識。

1907年，蘇氏被聘請到山西大學堂，擔任西齋總教習一職。他引進西方的物理、化學、礦物等學科，列為必修課，讓學生們體會，在物質世界的背後有位「定律的設計者」與「創造者」。儘管西方有些知識體系是從人本主義發展出來的，但亦有不



開通民風，栽培人才的藝文學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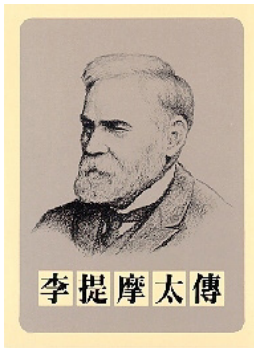
李提摩太創辦的山西大學堂

蘇慧廉……下功夫鑽研四書五經，深刻掌握了中國文化的精髓。

William Soothill . . . studied the Chinese Classics diligently and mastered the essence of Chinese culture.

少科學與法治的理論奠基在有神論的哲學信念上。

1924年，蘇慧廉出版了《李提摩太傳》（*Timothy Richard of China*），紀念這位山西大學堂的創辦人。李提摩太是位傑出的宣教士，在設立教會、賑災等方面多有建樹，而對中國最深遠的貢獻，乃是振興了廣學會的文字工作，使中國無數知識分子認識現代世界，並對基督教產生正面的看法。蘇氏可謂是承繼了李氏的異象。



李提摩太傳

醫療佈道表明神愛

道成肉身是耶穌基督展現文化宣教的典範，將看不見的神活生生地彰顯在人群當中：「從來沒有人見過神，只有在父懷裡的獨生子將祂表明出來。」（約翰福音1:19）宣教士如果單單以口傳揚神的愛，百姓很難真正體會；可是當他們以醫生的身份治療病痛，民衆接觸到他們無私的關切之心，就能夠感受到神的愛。

到中國之前，蘇慧廉只受過簡單的醫學訓練，然而在落後的溫州卻十分有用。蘇氏經常以西藥減緩病人的痛楚與病症，並且施行小手術來診治病情。一次，他為一位眼臉內翻的老人動手術，使他逐漸痊癒，因而得到「神醫」的雅號。他又用奎寧和補藥來治療毒癮，成績斐然，使戒毒工作成為福音傳播有利的媒介。

在神的引導中，醫療事工成為溫州宣教的骨幹之一。從定理（Dingley）醫院到後來的白累德（Blyth）醫院，成千上萬的病人因而受惠。在蘇氏所主持的醫院，窮人得以完全免費。這種行醫救



白累德醫院

人的策略，讓溫州老百姓深切感受到蘇氏的愛與關懷，也讓蘇氏贏得當地仕紳的讚譽。

處境化看待中國宗教

十九世紀末葉，對中國文化、傳統及宗教作系統研究、深入瞭解的宣教士，實在鳳毛麟角。蘇慧廉無疑是最突出的一位。他下功夫鑽研四書五經，深刻掌握了中國文化的精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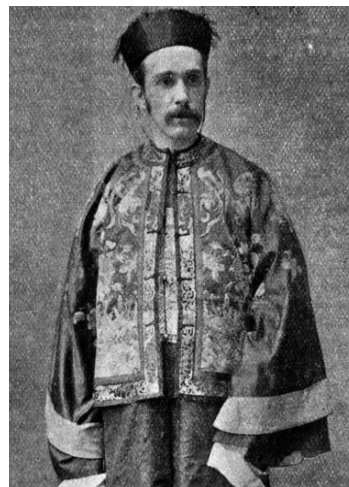
當時不少宣教團體的領袖對於儒釋道傳統抱持貶抑、排擠、甚至不屑一顧的態度，更極端者則視之為來自魔鬼。結果，中國人信主之後，往往必須把固有的傳統與思想完全拋棄。然而，蘇慧廉卻採取所謂「成全神學」（fulfillment Theology）的觀點，來處理中國傳統的宗教。

當時溫州有44座廟宇，其中屬佛教的有13座，屬道教的有6座，其餘的則是各種不同類型的孔廟。蘇氏認為，這三種不同的宗教傳統彼此互補，可構成一個圓圈。

儒家代表人對今世的探索，強調公正、義、和邦國；蘇氏視孔子為「可佩服的基督先驅」，他發現中國人對上帝和創造的信念是「缺乏指導的摸索」，讓中國人「對『永恆』產生些微的概念，……以致能倡導一些可貴、高尚的觀念」。

道家追求超自然，解析自然的力量、不朽、和個人主義；蘇氏認為，道家起頭甚好，但逐漸變質，不過最後恢復了一些「在靈魂範疇內對道與不朽的原初最求」。佛教闡述慈悲、冥想、從今世的貪痴中獲得解脫，並進入涅槃；蘇氏講述佛教的起源，說明其傳入中土後如何順應中國文化。回教在溫州也有幾百信眾，蘇氏以友善的態度提及他們。

其實，儒家對人生的理想只能在基督信仰中實現，因為唯有耶穌可改變人心。當人順服聖靈來生活時，仁愛與公義的社會便能成就。道家對本體的熱衷思考與對生命奧秘的探尋，均可在聖經與聖靈重生的經歷中獲得解答。苦難與業障是佛教思想的核心，修持與遁空並不是解脫之法；而耶穌十字架的救贖與復活才是人性困境的出路。



這位從英格蘭平凡家庭中出身的宣教奇才，竟在離世八十年後，仍被無數華人所懷念與感戴。 Eighty years after his death, this prodigy in mission, coming from an ordinary family in England, is still remembered and adored by many Chinese.

讓上帝規劃一生道路

在出發去中國之前，蘇慧廉從來沒有想到，有一天他會成為牛津大學的漢學教授。他的抱負只是想當一位神忠心的僕人，以愛與生命來服事中國人。

他22歲時（1883年）即到中國瀕海小城溫州事奉；47歲時，前往山西大學堂擔任總教習；後來又受聘為華中聯合大學的校長（註：後因戰爭爆發，建校計劃未能實現）；在戰亂紛飛的歲月，他又曾擔任青年會的幹事。50歲時（1911年）他有機會到法國，創立了華工青年會，照顧華工的生活。59歲

（1920年）他成為牛津大學漢學教授。67歲（1928年）他受聘為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訪問教授。這一切耀眼的人生經歷，並非他渴望追求的目標，而是順服上帝引導的結果。

蘇慧廉年輕時將自己奉獻給神，他心中所關注的是：如何有效地把福音傳開。總教習、校長與牛津大學教授等耀眼頭銜，都不是他的規劃。只是神奇妙的手，在一個完全委身的器皿上彰顯出祂的榮耀。對蘇氏而言，精采的人生並不是他的夢想；然而這位從英格蘭平凡家庭中出身的宣教奇才，竟在離世八十年後，仍被無數華人所懷念與感戴。

之二：望溫州思全球

《中國的耶路撒冷——溫州基督教歷史》序

歷史常使人增長見識，透視世間萬象，領悟千古不變的道理。研讀教會歷史，更讓人心曠神怡，洞察神的大能與信實，獲得屬天甘霖，其價值勝過地上珍寶。

二十世紀下半葉，隨著溫州人散居世界各洲，披荊斬棘，建立家園，他們的勤奮刻苦、經商創業的卓越才能，至今已聞名全球。更難能可貴的，這些溫州商人帶著虔誠的信仰，在歐洲、南美洲建立教會，成為海外華人尋覓真理的重要據點。舍禾所著《中國的耶路撒冷——溫州基督教歷史》（上下兩冊），深入剖析這座瀕臨浙江東岸的海港城市蒙神賜福的來龍去脈，也說明了溫州人一面經商、一面建立教會的獨特作風。

賴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是二十世紀研究教會歷史最富盛名的學者之一，他對中國教會歷史的研究，在西方更是獨樹一幟，無人能比。他曾著《基督教史》（*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上下兩冊，分析各個地區教會發展與政治氛圍、歷史情境、地理位置、經貿活動、傳統宗教、社會結構、哲學理念等背景之間密切的關係。舍禾對溫州教會的研究，亦嘗試從各個角度全面來探討基督教何



以能在當地紮根，並且經過一百多年，仍能持續蓬勃興盛。

研究教會歷史有五方面的價值。首先，讀者可以看見神的權能，在困難重重、甚至四面楚歌的環境中，如何為祂的子民開出一條坦途。第二，耶穌曾說，祂要把教會建立在磐石上，陰間的權力不能勝過她。在教會成長的過程中，來自魔鬼的打擊與破壞無法避免，然而，在信徒心中內住的基督，比世上任何權勢更超卓偉大。第三，任何教會都會有得勝與軟弱的正反兩面，正如啓示錄所描繪的七間初代

教會一樣。閱讀地區性教會的歷史，能從其中得到寶貴的教訓。第四，教會既然是基督的身體，普世教會所經歷的各種掙扎與問題，通常地區性教會也有類似遭遇，例如：對於不同神學派別的取捨、教會體制的建立等。第五，研讀特殊地區的教會歷史，一定會給已在當地服事的牧長、傳道同工、或將到該地去建立教會的宣教士提供實際的指引或建議。這本《溫州基督教歷史》是最鮮活的例證，必使讀者開卷有益。

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王治心的《中國基督教史綱》以來，不斷有優秀的基督徒學者研究中國教會

對於温州教會的了解，必須擴大到以全球基督教發展的視野來探索。
In order to understand Christianity in Wenzhou, we must have a broad horizon of the global development of Christianity.


歷史，挖掘出珍貴的史料，向世人揭露華人教會奮鬥的辛酸，以及慈愛天父如何保守看顧在荊棘和患難中成長的教會。筆者從小在台灣長大，目睹林治平、王成勉、呂實強、查時傑等研究教會歷史的前輩，如何藉著教會歷史，鼓勵台灣教會奮勇向上，後來又有魏外揚、林美政等繼續耕耘。香港過去有趙天恩所創辦的教會歷史研究中心，接著又有李志剛、林榮洪、梁家麟、邢福增等學者，不斷伏案撰述，以致西方宣教士對中國現代化的貢獻，在今天的學術界獲得普遍的肯定。北美也有王忠欣、吳秀良、姚西伊等人，積極從事華人教會的研究。中國大陸近年有顧長聲、章開沅、馬敏、段琦、徐以驊、陶飛亞等人著書，令教會歷史的學術園地生氣蓬勃。本書的面世將使這領域的研究更加豐富。

2014年四月底，溫州市屬於三自、富麗堂皇的三江教堂遭受當局徹底拆除，再次引起全球基督教界對温州教會的關注。過去幾十年，人口約一千萬的溫州市，教堂林立，而且許多是超大型的建築，在全中國可謂絕無僅有。這現象一方面顯示温州基督徒人數比例之高，一方面也披露温州基督教在地方上的影響，讓教會有更大活動的空間。

今天研究中國教會，必然無法忽略溫州的教會。雖然溫州的情境相當獨特，與北京、上海、廣

州、成都等大城市截然不同，然而在現今交通便捷、互聯網普及、新傳媒發達的時代，溫州教會所面臨的問題，與不少城市家庭教會遭遇的挑戰亦有雷同之處。如今，任何地區的華人教會都不可能把自己封閉起來。不管在政教關係、神學教義、教會治理模式與制度等方面，溫州教會和其他地區教會一樣，都必須在神州大地基督的「生命共同體」之下，來檢視與分析自己的處境。

另一方面，全球化或全球村的概念，是二十一世紀無法避免的趨勢，因此，對於溫州教會的了解，必須擴大到以全球基督教發展的視野來探索。諾爾（Mark Noll）所著的《世界基督教新形勢》（*The New Shape of World Christianity*）、任肯斯（Philip Jenkins）所著的《要來的基督教國度》（*The Next Christendom: The Coming of Global Christianity*）、蕭馬可（Mark Shaw）所著的《全球復興》（*Global Awakening*）等書，都提供了不少寶貴的資料與亮光，讓我們能更準確地掌握神在今日教會中的作為。溫州教會既是全球基督教的一部分，它的發展與資源，和對第三世界未來的潛在影響力，亦與全球息息相關。由這個角度來剖析，可以把我們帶到更高的平台，使華人教會與普世教會接軌，讓溫州教會承擔普世宣教的責任。（續下頁）



恩福 YouTube 網絡視頻

2009年開始，恩福會長陳宗清牧師經常在橙縣中華福音教會講道，該教會也將主日信息錄影存檔。本編輯部已經將這些信息加以製作，並上傳到youtube。截至目前，共計上傳162篇。其他網站也有播放。

若要在網上觀看，請登陸youtube之後，輸入關鍵字，如搜索：陳宗清牧師、恩福文化宣教使團、橙縣中華福音教會、中福主日信息等。

視頻共分八大類別以便搜索：佈道培訓、經卷系列、福音信息、靈命成長、基督徒生活、教會建造、節日慶典、普世宣教。

可以按你感興趣的主題搜索，例如：救恩、逆境、信心、感恩、復活節、羅馬書、哥林多前書等。

陳宗清牧師的信息已製作成《恩福佈道培訓系列》，有CD和DVD兩種選擇，共出版了三集，歡迎訂購。價格請參考第22頁索閱單。

若您需要，也可以選擇任何一篇講道，由本刊同工刻錄成CD或DVD，郵寄給你，詳情請與編輯部聯絡。

Email: enfu@bf21.org

解析文化與圖騰

——兼談“羊文化”成立嗎？

李 靈

小說《狼圖騰》2004年問世，幾年來持續熱銷；截至2014年底，發行人數已突破百萬大關。2015年2月，《狼圖騰》搬上銀幕，新春票房火爆。與此同時，該書在歷史、民族等問題上引發的爭議，也再次上演。



針對《狼圖騰》一書引發的社會效應，中國教會內出現聲音，試圖用“羊文化”來反制“狼文化”。然而，筆者對“羊文化”的概念卻有所質疑，藉本文權當引玉之磚，希望引起討論。

狼圖騰的震撼

《狼圖騰》的“編者薦言”，溢美之言幾近極致，稱之為“這是世界上迄今為止唯一一部描繪、研究蒙古草原狼的‘曠世奇書’。”著名蒙古歌唱

家騰格爾說：“它讓我讀出：深沉、豪放、憂鬱而綿長的蒙古長調與草原蒼狼幽怨、孤獨、固執於親情呼喚的仰天哭嗥，都是悲壯的勇士面對長生天如歌的表達……”作家周濤說：“它直逼儒家文化民族性格深處的弱性。……更顯示了我們正視自身弱點的偉大精神。”文學研究員家孟繁華寫道：“如果將它作為小說來讀，它充滿了歷史和傳說；如果將它當作一部文化人類學著作來讀，它又充滿了虛構和想像。”

對該小說主要的批評為：內容有悖蒙古史實和文化信仰。蒙古族作家、民族創作委員會主任郭雪波，2月間在微博上指出：“狼從來不是蒙古人的圖騰”，“宣揚狼精神是反人類的法西斯思想。”又發表公開信，列舉《狼圖騰》嚴重歪曲民族歷史文化、侮辱蒙古祖先等問題。

圍繞該小說的褒貶之聲不絕於耳，原因還不僅是因它打破了人們對“狼”的印象。該書“編者薦言”的末了，提出一系列問題：“本書由幾十個有機連貫的‘狼故事’一氣呵成，……狼的每一次偵查、布陣、伏擊、奇襲的高超戰術；狼對氣象、地形的巧妙利用；狼的視死如歸和不屈不撓；狼族中的友愛親情；狼與草原萬物的關係……無不使我們聯想到人類，進而思考……：當年區區十幾萬蒙古騎兵為什麼能夠橫掃歐亞大陸？……我們不能不面

(接上頁)

過去五年，我去過溫州兩次，有機會和其中的某些教會團體接觸，培訓教會傳道同工，親自體會這個中國耶路撒冷的種種特色。去年藉著沈迦的《尋找，蘇慧廉》，使我對於溫州教會的成長有更濃厚的興趣。神揀選這塊土地，使用溫州人獨有的性格與文化，讓基督奇妙的福音改變了數百萬華人的心靈。瞻望未來，我們深信神會作更偉大、更令我們驚奇的事。《溫州基督教歷史》為我們揭示個中的若干主要原因。

2008年暑假，由於舍禾在基督教文字事奉上的

優秀表現，恩福文化宣教使團接納他作神學生，提供獎學金，筆者因而與他相識。這些年不斷有機會與他見面深談，或藉電子郵件交流。三年多前筆者去北加州探望他時，本書的雛型方才完成，舍禾特意向我徵詢意見。如今目睹他嘔心瀝血之作付梓，倍感欣慰，是為序。✠

(編註：本書將由宇宙光出版社於2015年出版)

作者為本刊主編，恩福文化宣教使團會長

圖騰就是原始人迷信某種動物或自然物同本氏族有血緣關係，因而用來做徽號或標誌。 Totem was a tribal symbol or emblem expressing the superstition of the primitives that their ancestors were related to certain animals or created things.

對我們曾經輝煌也曾經破碎的山河和歷史，發出叩問：華夏民族的龍圖騰是否將從此揭秘？”這些問題帶著歷史的沉重，又透著先知的敏銳；勾起了心靈深處的傷痛，激起了時代的使命。整個民族的胸口彷彿受到了沉重的一擊。

羊文化的提出

試圖以“羊文化”來反制“狼圖騰”，基本上是出自教會內部的聲音。因為基督徒是“主的小羊”。眼看社會受到《狼圖騰》影響，有崇尚“狼文化”的趨勢，我們這些“小羊”豈不被迫置身狼群？倡導“羊文化”確實也不失為一作法。

有人認為，“羊文化”不僅有基督教信仰的依據，還有中國文化歷史的傳承。因為，中國傳統文化誕生時，與羊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據最新考古發現，距今大約8000年前的河南新鄭裴李崗文化遺址，以及距今約7000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遺址，都出現了陶羊。



可以說，“羊的基因”滲透中國傳統文化的方方面面。在文明進程中，“羊”所起的作用甚至超過了“龍”。“三皇”中的伏羲、神農，最早都以“羊”為部落圖騰。據考，伏羲曾受“羊角柱”的啟發，發明了“八卦”。堯舜時代的大法官皋陶，曾藉助獨角神羊斷案，從而實現古代司法公平。漢代董仲舒將儒家文化的核心“仁”、“義”、“禮”賦予到羊的身上，贊嘆羊是“美”、“祥”之物。明代將“羊之跪乳”編進兒童啟蒙讀物《增廣賢文》中，將羊塑造成懂得感恩的典範……

中國漢字的字源、語源，同樣能捕捉到大量關於羊與早期文化生成的關係。最早的卜辭表明，殷商時期“六畜”俱全；而在《甲骨文字典》裡，以馬、牛、羊、雞、犬、豕“六畜”為字根的漢字中，羊部字數最多，如：“羊大為美”、“羊魚為鮮”、“羊食為養”、“羊言為善”、“羊我為義”等等。

然而，中國古代的“羊”和《聖經》所講的“羊”是一回事嗎？如果說“狼文化”的核心是“狼圖騰”的話，那麼，“羊文化”也是以“羊圖騰”

為核心嗎？

剖析圖騰文化

中國傳統文化曾經對“羊”推崇，是因為把“羊”作為“圖騰”物。許多文明的發展，都經歷過一段“圖騰”崇拜的歷史。

“圖騰”一詞源於印第安語（totem），意為“它的親屬”，“它的標記”。嚴復是首位將此詞譯成“圖騰”的學者。他指出，圖騰是群體的標誌，旨在區分群體；中國古代有圖騰現象，與澳大利亞人和印第安人相似。運用圖騰解釋神話、古典記載及民俗民風，可獲舉一反三之功。

換言之，圖騰就是原始人迷信某種動物或自然物同本氏族有血緣關係，因而用來做徽號或標誌。圖騰信仰與祖先崇拜密切相連。圖騰具有團結群體、維繫社會的功能，也具保護意義。

今天，各民族在宗教和社會文化上早已超越了“圖騰”意識。不過，作為文化標誌，一些圖騰“藝術性”地保存下來。例如，在印第安人的村落中多立有圖騰柱。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華表，就是漢民族的圖騰柱。



華夏民族的圖騰

文化人類學家可以從出土文物上的圖騰圖案和雕刻，來劃分文化類型及其發展階段。比如，中國彩陶上的圖騰。彩陶紋是新石器時代最引人注目的藝術之一，動物紋中，常見的有魚紋、鳥紋、壁虎紋、蛙紋、豬紋、羊紋等，在黃河、汾河、大夏河和渭河流域都留下這類彩陶器物。魚紋是最常見的形像之一；人面魚紋彩陶盆是很好的例證。

華夏歷史是多部落、多民族、多文化不斷相融的歷史，因而會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出現不同的“圖騰”，同一時期也會有不同的“圖騰”文化。古代黃河中下游、渭河流域有炎帝部落、黃帝部落，黃河下游有少昊部落，江淮流域有太昊部落。史稱炎帝部落首領“牛首人身”，故有些學者認為該部落以牛為圖騰；但炎帝的族姓是“姜”，可以認為，姓從母系，姜即為羌，故炎帝的母系圖騰為羊。黃

從《舊約》到《新約》，基督教是杜絕“圖騰崇拜”的。
According to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s, Christianity is against Totem worship.

帝，意為黃土高原的統治者，其圖騰應為黃土。少昊部落以鳥為圖騰，太昊部落則以龍為圖騰。

歷時最久的，當數對龍的崇拜，延綿至今已有一萬數千年。可是，為什麼“龍”從眾多的崇拜物中脫穎而出？究竟從何時開始？這些問題至今還是個迷。也許在華夏各族心目中，龍的能力非凡：有鱗有角，有牙有爪，能鑽土入水，能蟄伏冬眠；能興雲布雨，又能電閃雷鳴。而無論古今，都沒有龍的確切形像。現時所表述的，是將龍形像完美之後的形態。龍最初的形像是什麼？西安觀博物館有許多出土的玉器，上面龍的雕塑原始形態都指向“蛇”形。

可以肯定的是，“龍圖騰”的文化在歷史上凝聚了華人的積澱。圖騰文化的核心是圖騰觀念，圖騰觀念激發了原始人的想像力和創造力，逐步滋生了圖騰名稱、圖騰標誌、圖騰禁忌、圖騰外觀、圖騰儀式、圖騰生育信仰、圖騰化身信仰、圖騰聖物、圖騰聖地、圖騰神話、圖騰藝術等，從而形成了獨具一格、絢麗多彩的圖騰文化。

無論是曾經輝煌過的“羊圖騰”，還是今天獨占鰲頭的“龍圖騰”，所表明的只是華夏各族逐漸融合成“炎黃子孫”和“龍的傳人”的歷史階段。從“羊的傳人”到“龍的傳人”的演化，就“圖騰文化”的本質而言，絲毫沒有實質性的差別。

聖經否定圖騰文化

可以肯定地說，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羊崇拜”（或者崇拜羊）是“羊圖騰”文化，這與《聖經》中屢次提到的“羊”，意義完全不同。前者是“圖騰”，後者則只不過是“比喻”。

其實，從《舊約》到《新約》，聖經一直在清除殘留在人類心靈中的“圖騰”意識。

《舊約》出埃及記32章記載，逃離埃及的猶太人見摩西上山面見耶和華，遲遲未歸，就要求亞倫為他們鑄金牛犢。以色列人長期在埃及為奴，早已遺忘先祖所敬拜的上帝，在信仰上受到埃及文化很大的影響。埃及的牛神阿必斯，傳說是由天上降下的一道光芒成孕，具有預言能力，其氣息能使疾病痊癒，帶來生生不息的精力。以色列人身體雖離開了埃及，但心靈卻接受了埃及的“金牛犢圖騰”，所以要打造金牛犢。耶和華對此事非常生氣，百姓受到嚴厲的懲罰。這是耶和華神不能容忍的罪。

列王記下18章記載，希西家王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廢去邱壇、毀壞柱像，砍下木偶，甚至打碎摩西所造的銅蛇，因為以色列人向銅蛇燒



香。當年上帝命摩西造銅蛇，將其舉起，是以它作為信心仰望的象徵。而當人們開始榮耀這銅蛇時，它就要被打碎。希西家用“廢去”、“毀壞”、“砍下”、“打碎”等一連串舉措，要消滅所有“圖騰”崇拜殘留的標記和行為。

《新約》多次用“羊”來做比喻：稱陷在罪中不能自拔的人為“迷途的羊”；稱需要神看顧、帶領、餵養的信徒為“羊群”；希望信徒像“綿羊”一樣順服；又稱願意擔當眾人的罪、為我們捨命的耶穌基督為“替罪羔羊”。但是，《新約》從來沒有說我們與羊有血緣關係，或要我們變成羊。“羊”絕對不是基督徒的“圖騰崇拜”對象。

甚至連“十字架”，聖經也未將它圖騰化。保羅所強調的，是“耶穌基督”以及祂“被釘十字架”的事件。主耶穌要門徒“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是要門徒把自己身上那“世界的屬性”治死；唯有這樣，才能從主那裡得到新生命。而“十字架”本身並沒有什麼神奇。

我們清楚看到，從《舊約》到《新約》，基督教是杜絕“圖騰崇拜”的。猶太人是最早從“圖騰”崇拜和文化中脫胎出來的民族。凡皈依造物主的民族或群體，也都與自身原來的“圖騰”崇拜和傳統劃清了界限。天主教的神學和體制中還有“聖物”崇拜的現象，然而改教之後，新教（基督教）內就不再有“聖物”崇拜。

對羊文化的質疑

為什麼中國教會出現用“羊文化”來反制“狼文化”的聲音？筆者認為，這很大程度與傳統文化對華人教會的影響有關。

十九世紀初西學東漸，中國傳統文化受到強烈的衝擊。士大夫仇洋排外，對基督教和西方價值觀一味抵制，製造了許多衝突事件（教案）。十九世

幫助中國教會提升分辨力，認出傳統文化中殘留的圖騰意識……等等，無疑是當前文化宣教最主要的内容和使命。The urgent duties in cultural mission should be to raise the level of discernment of the Chinese churches to discard the dregs of Totem, etc., in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紀後期，新一代的文人學士開始意識到，傳統作法確實存在許多不合理的地方；但是，對於隱含在其背後的文化價值等問題，還沒有深入去探究。

二十世紀是“革命的世紀”，關於傳統文化的批判與更新等學術討論的話題，都被擱置了。以“革命”名義進行的種種戰爭，折騰了半個世紀。1949年以後，統一的中國內部卻繼續鬧革命。最終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才真正終結了近代中國靠“革命”來“圖騰”的夢魘。

進入二十一世紀，中國的物質財富急速增長，精神領域卻嚴重錯亂。人們開始用黃金打造的金箍棒來攪動沉澱的傳統。沈寂多年的各樣巫術邪說，在現代的包裝下粉墨登場。圖騰崇拜依然具有相當的影響力。簡而言之，中國的傳統直到今天都沒有好好梳理，更談不上更新。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後，中國各地教會洶湧而起，可是，傳統文化的影響也湧入教會。如，把教



堂當做教會，把十字架當做“聖物圖騰”，追求理想和計劃，追求有如特異功能的醫治能力，把異夢當異象，把囁語當作神在說話，甚至把某些數字、時間的巧合賦予屬靈的意義。甚至一些受過良好教育的信徒仍被圖騰意識操控。我曾目睹一位畢業於哈佛的博士，努力將辦公室的擺設適合“風水”；也曾有博士對我說，傳統巫術和圖騰崇拜仍有存在的價值。我把這些現象統稱為現代迷信。

農村教會更常出現迷信行為，如：將《聖經》當成護身符或壓邪鎮惡的法寶；耶穌被看成最大的神，拜祂就像從前拜偶像一樣；“哈利路亞”被視為趕鬼驅魔時的咒語。遇到天災人禍時，教會扮演著傳統宗教的角色，組織禁食禱告，求上帝降雨或放晴。這種強烈的實用性和功利性，無疑是傳統（民間）宗教特性對基督教的影響。

至於“羊文化”之說，筆者認為，古代羌人崇拜“羊”是屬於“圖騰崇拜”，與基督裡的“羊”絕對不是一回事。因此，此說並不合宜。然而，如

果倡導“羊文化”的目的，是為了批判“狼文化”，那就另當別論。當前中國社會道德滑坡、行為失控，就如同當年霍布斯所描述的“人與人是狼”的社會關係；現在的文化無異就是“狼文化”。

即便如此，姜戎的《狼圖騰》是在提倡“狼文化”嗎？這到底是“文化”問題還是“意識形態”問題？用“羊文化”便可反其道而行嗎？恐怕並不那麼簡單。



我認為，我們應當專注在對傳統文化、習俗、價值等等的研究，探討其中有哪些會影響基督教在華人群體中的正常傳播，有哪些會妨礙華人基督徒的生命成長。幫助中國教會提升分辨力，認出傳統文化中殘留的圖騰意識、巫術魔法、與信仰相悖的習俗、價值觀念等等，無疑是當前文化宣教最主要的内容和使命。☒

作者為基督教與中國研究中心總幹事

編按：

今年6月6日，「第三屆信仰與當代藝術研討會」在洛杉磯舉行，主題為：「羊年講羊文化論壇、畫展」。此研討會第一、二屆曾於2010、2011年於北京宋莊召開。本屆由恩福文化宣教使團協辦；參展畫家為朱久洋、施瑋、夏訓智。部分畫作圖請參封面裡。

論壇有四位發言。陳宗清牧師講「上帝與美——神學的繪畫（或繪畫的神學）」；曼德牧師講「羔羊必勝」，說明「羊文化」應有何特色，如何在企業界與社會落實；畫家夏訓智從形象藝術的角度講「神佑的失落——從羊圖騰到龍圖騰」；作家施瑋講「羊文化與環境」，探討如何營造羊能生存的生態。

李靈牧師未能親身到場，僅以此文參與回應。



向上之民

吳家望



筆者曾就聖經希伯來文的動詞 *hl* (*alah*, 向上行) 寫了一篇文章, 叫“*Alah Olah!* 獻上燔祭”。上帝是“至高者 *!wyl* (*Elyon*), 高高在上, 所以向上帝唱的詩歌叫做“向上行之歌”, 向上帝獻的祭叫做“向上行之祭”, *hl[o* (*olah*, 通常譯為“燔祭”), 走向上帝的聖地是“上 *hl* 耶路撒冷”, 而不是“去耶路撒冷”。嚴肅的神學題材令人望而生畏, 但“向上行”的觀念卻帶人進入廣闊的文化領域。

二十世紀大文豪魯迅年輕時 (1908年), 曾在日本為留學生的《河南》雜誌寫了一篇“破惡聲論”, 文章最終沒有寫完, 但其中有一段令人矚目的話:

古希伯來之民, 大觀天然, 懷不思議, 則神來之事與接神之術興, 後之宗教, 即以萌芽。雖中國志士謂之迷, 而吾則謂此乃向上之民, 欲離是有限相對之現世, 以趣無限絕對之至上者也。

魯迅的愛國主義思想眾所皆知, 但他的信仰卻是多年來不便探討的問題。直到近幾年, 學者們才著手研討他對宗教信仰的追求和看法。有人認為, 魯迅的宗教哲學傾向於以“希伯來精神”為源頭的“有神論存在主義”。此課題有待專題討論, 今天我們只借以上魯迅這段話來淺談一下。

魯迅這一段話是年輕時的文言文作品, 筆者“翻譯”一下, 供讀者參考:

古代希伯來人面對大自然壯觀, 深感不可思議, 於是從上帝而來的事和與上帝交通的

門路興起, 後來的宗教因而萌芽孳生。雖然中國志士認為是迷信, 而我卻稱他們是向上之民, 希望離開有限、相對的現今, 去追求無限、絕對的至上者。

咀嚼一位27歲的留學生所說的這段話, 可看出魯迅那時對西方宗教和聖經已經有過深入的學習和思考。魯迅對信仰的追求也許處於初階, 但他所看到“有限、相對的自然主義”與“無限、絕對的超自然主義”之間的矛盾, 一百年後仍是中國志士面對的課題, 甚至難度更大。

後人認為, 魯迅所說的“向上之民”乃是後來他筆下祥林嫂那樣, 探索靈魂與地獄之存在, “發出天問, 向上求索”的人。這種比較是否牽強, 值得商榷。但是古今中外, 多少宗教界、哲學界、科學界的思想家們都涉足過靈魂這個領域, 多數沒有找到答案。

希伯來精神

現代學者所討論的“雙希精神” (希伯來和希臘精神) 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末著名英國文學家阿諾德 (Matthew Arnold) 所闡述的“希伯來精神和希臘精神 (Hebraism and Hellenism)”。阿諾德為希伯來精神所下定義的內涵, 包括“自我征服 (self-conquer)、自我真誠 (self-devotion)、順從和克制, 不追隨個人的旨意、只追隨上帝的旨意。”

希伯來精神中的服從, 和其他民族歷史上盲目順從人間的掌權者不同。希伯來民族所信服的是創造宇宙萬物、統治宇宙生靈的上帝。這就是魯迅說指出的“無限絕對之至上者”, 或希伯來人所歌頌

魯迅先生說，向上之民欲離有限相對之現世，以趣無限絕對之至上者也。Mr. Xun Lu once said, the Up-Going People wanted to leave this world that is limited and relative, and to approach the Highest One who is limitless and absolute.

的“至高者” *!wyl* (*Elyon*，詩篇47:2, 9)。

簡言之，阿諾德所言“不追隨個人的旨意、只追隨上帝的旨意”，概括了“希伯來精神”的含義。用聖經的言語來說，即如：“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祂，祂必指引你的路”（箴言3:5-6）；“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箴言9:10）。

二十世紀初，魯迅的二弟周作人先生所探索的“二希”思想（希伯來和希臘思想），傳承了阿諾德的說法。周作人十分重視這些思想意識，評價它們為歐洲文明的源泉。他認為它們是一物的兩面：“希臘思想是肉的，希伯來思想是靈的；希臘是現世的，希伯來是永生的；希臘以人體為最美，所以神人同形，又同生活。希伯來以為人是照著上帝的形像造成，所以偏重人類所得的神性，要將它擴充起來，與神接近，以至合一。”

學習這些對世界文化科學的發展有積極影響的古典精神，必然有助於中國政治、經濟、文化和信仰的改革和發展。

文學希伯來主義

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說，希伯來語言是無與倫比的語言（the best language of all）；新約聖經雖是用希臘文，但充滿了希伯來精神和希伯來措辭語法。在文學界，“希伯來精神”代表希伯來語言在文格、文風各方面對其他民族語言的影響。以“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就是聰明”這句名言為例，希伯來文的對應（parallelism，平行），不但希臘文譯文（下右）與其字字相應，在中文譯文中也能表達出來：

(是) 智慧的開端	hmkx tlxt	avrch. sofi,aj
敬畏 耶和華	hwly tary	fo,boj kuri,ou
認識 至聖者	~yvdqt[dw	kai. bough. a`gi,wn
(是) 聰明	tnyb	su,nesij

又如，“上帝啊！我的心（靈魂）渴慕你，好像鹿渴慕溪水”（《詩篇》42：1），就以希伯來文的對應，表達希伯來人靈魂的追求：

好像鹿 渴慕 溪水	~ym-yqypa-l[gr[t lyak
我的靈魂 渴慕 你上帝啊	~yhla	^yla gr[t yvpn !k

“心”和“靈”在希伯來和希臘文都是一字二意，分不開的。中國人所說的“心靈”也有這樣意思，但是，如果我們所說的“心靈”只是種抽象的靈魂，沒有與上帝的生命連接，就難能連接上帝的



祝福。

新、舊約聖經充滿這樣的文學“希伯來精神”。讀者不妨細心研讀新約福音書的“登山寶訓”，體會希臘文經文的平行對應結構。正如《箴言》這一節經文一樣，新約中耶穌的言語以及使徒們的記載，都從民族氣質、神學和文學等不同角度體現出上帝子民的“希伯來精神”。

無限絕對之至上者

十九世紀後期，隨著達爾文主義的傳播，馬克思唯物主義思想應運而生。到了二十世紀初，中國年輕知識分子接受這些革命思想，突然從腐敗社會中看到一線曙光。

二十世紀中期，宇宙大爆發論及DNA生命藍圖推出了劃時代的科學革命與極限。稱之為革命，是因為科學竟然能逐步解釋以往不可思議的宇宙“起源”和生命“起源”問題；稱之為極限，因為現代科學的資料顯示，科學家懂得越多，難題就更多更難；科學永遠不可能徹底解答宇宙起源和生命起源的問題。

隨著科學和信仰的對話，諸如智慧設計論、神導進化論等，吸引了許多名人知士的支持。經常和有神論學者辯論的著名無神論科學家道金斯（Richard Dawkins）不耐煩了，大喊說，“這不是進化論與創造論之間的戰爭，而是自然主義和超自然主義之間的大戰”。他用馬克思的語氣說：這不是知識（intellectual）鬥爭，而是政治（political）鬥爭，是社會（social）鬥爭。道金斯高喊道，科學和信仰沒有共存的餘地：宗教是萬禍之根，唯有唯物主義科學才是能夠消滅宗教的救星。

魯迅先生說，向上之民欲離有限相對之現世，以趣無限絕對之至上者也。相反，道金斯先生則欲離無限絕對之至上者，以趣有限相對之現世，豈非向下之民也！

信仰與科學正在並肩參與一場無盡、無懈的戰役，反對懷疑主義，反對教條主義，……戰鬥口號曾經是、永遠是：奔向上帝！ Faith and science are fighting together in an endless battle, against skepticism, dogmatism, etc. The slogan of the war was, and forever is, “Up to God!”

奔向上帝！

普藍克（Max Planck, 1858-1947）是與愛因斯坦齊名的德國數學物理泰斗，量子力學先驅，1918年諾貝爾獎得主。泰斗群中，愛因斯坦數一，普藍克數二。1937年，普藍克在歐洲多國發表“信仰與科學”（Religion und Wissenschaft）的演說，轟動一時。他演講的最後一句口號“奔向上帝！”帶來全場起立的掌聲。



普藍克說，他童年時所烙印的信仰是：他的靈魂泉源乃是他任何時間都能在那兒避難的、高高在上的另一世界。誠然，普藍克所奔向上帝，就是聖經所歌頌的“至高者”（!wyl, Elyon）。

普藍克說，信仰與科學正在並肩參與一場無盡、無懈的戰役，反對懷疑主義，反對教條主義，反對不信，反對迷信。這場戰役的戰鬥口號曾經是、永遠是：奔向上帝！（Up to God!）

作為一名大科學家，普藍克認為，人皆有之的宗教信仰的基礎是：人在面對極大威力時的尊敬和驚嘆。有信仰的人不可能用邏輯證明上帝的客觀存在；但是，他個人所信仰的是：相信上帝的存在是永恆的，無需依靠世界和人的存在。上帝將這世界掌握在祂絕對大能的手中。普藍克含蓄地說，若要指出信仰者和科學家之間有何區別，可以說，在前者心中，上帝站在一切思維的起點，而在後者心中，上帝站在一切思維的終點。普藍克的忠告是：應當努力培養每個人個性的互補和互助的兩方面：信仰與科學。

1923年普藍克在普魯士科學院以“因果法則與意志自由”為題公開演講時說：

科學與宗教，真實上並不構成對立，而是對嚴正思考的人，為互相補益的東西。一切時代大思想家同時也是很深的宗教者（“很深的宗教者”英譯 *deeply religious souls*），正非偶然，儘管他們不情願把他們最神聖的公然顯露出來。（採用和普藍克同時代中國哲學家楊一之的譯文）

楊一之先生所譯“很深的宗教者”原來是普藍克所說的“有深刻信仰的靈魂”。

Olah Goleh, Golah Oleh 歸去來兮

2500年前的耶路撒冷，從擄掠之地回來的流亡者（hlwg, *golah*）的後代，向以色列的上帝獻燔祭（hl'A[, *olah*）（《以斯拉記》8:35，自譯）。從這句經文，我們要推敲兩個字。“流亡者”出於動詞 hlwg (*golah*，向遠處去，go away)，意思是“離開的人”，也就是被流放的人。向上帝獻的燔祭 hl'A[(*olah*) 出於動詞 hl[(*alah*，向上行)，是“向上行之祭”的意思。

世界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民族比以色列人更能體會“流亡”的意義。“流亡”的現代意義是“移民”，“被驅逐”離境的概念已漸漸淡忘了。“移民”有兩個方面：移出（離開）和移入（回歸）。流亡者（hlwg）一字表達的是背井離鄉、“移出”之民。現代希伯來語中，稱移民回歸為 hyll[（或作 hyl[, *Aliyah*，意為immigration，字根為 hl[，向上）。

古代詩人歌頌上帝說：“你從自己的樓閣（hyl[, *aliyah*）中澆灌群山，因你所作的事的果效，大地就豐足。”（詩篇104:13）。所以 *Aliyah* 形容一建築物的高處（upper chamber），或表達上帝所在。

亡國2500年後，以色列於二十世紀中葉復國，猶如神蹟。現代以色列人稱回到祖國為 Making Aliyah - 抵達了高處。移民回歸者叫做 mylA[(*olim*，immigrants，複數)。男、女回歸者又分別稱為 hl,A[, hl'A[(*oleh, olah*)。這幾個字的字根都是動詞 hl[(*alah*)，向上行。在聖經以斯拉記8:35中，hlw[(*olah*) 的雙關意義：“女回歸者”和“燔祭”正巧是同一個字：*olah*，因為它們都來自動詞 hl[(*alah*，向上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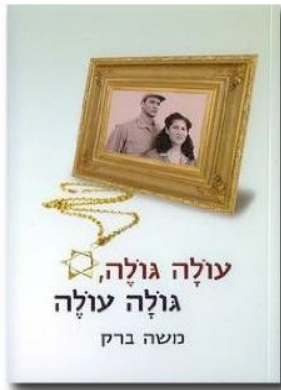
進一步推敲希伯來文的三個動詞：hl[(*alah*，向上行)、dry (*yarad*，向下行) 和 hlwg (*golah*，向外行)。

流亡者（hlwg）是被迫“移出”之民，是“向外行之民”。以色列人傳統認為，上耶路撒冷，或是上以色列，都是 hl[，“向上行”。所以，移民回歸的猶太人 (*oleh, olah, olim*) 是“向上行之民” (someone who goes up)。相反，和 hl[(*alah*，向上) 相對的動詞是 dry (*yarad*，向下)。所以，從以色列外移的人 (emigrating from Israel) 稱為 hdyry (*yeridah*)，“向下行之民”也。

現代以色列文學家巴拉克 (Moshe Barak) 用希伯來文寫了一本小說，名為 “*Olah Goleh*,”

魯迅和普藍克遠隔萬裡、同時提倡希伯來精神，要仰望那位“無限絕對之至上者”。Mr. Lu and Mr. Plank, though thousand miles apart, both promoted Hebraic spirit, encouraging people to look to the Highest One, limitless and absolute.

Golah Oleh” (hlw hlwg hlwg hlw[)。這書名勉強翻成印歐語是“Emigrantes Immigrant, Immigrantes Emigrant”。中文譯文可說是“歸者去兮，去者歸兮”。巴拉克巧妙地用來希伯來語的對仗來命名，反映唯有以色列民族才能懂得的歷史意義。



從十九世紀末開始，歐洲各國的排猶運動逼使幾批猶太人遷移到巴勒斯坦、敘利亞地區。自1948年復國以後，以色列人離開寄人

籬下、受盡歧視的環境，從世界各地成批移回祖國。這些新移民說的是俄語、英語、土耳其語、波蘭語等等。他們回歸後第一件事就是復興和推廣古老的希伯來語言，重溫與上帝所立古老之約。

當新一代的基督教和猶太教神學家將新約聖經從希臘文回譯成希伯來文時，他們發現，耶穌的教導和福音原來是傳給以色列人的！聖經說，難道上帝丟棄了他的子民嗎？絕對沒有！（羅馬書11:1）。以色列人是 *hyll* (*Aliyah*)，向耶路撒冷，向上帝，向上行的民族。他們更是懂得預言的民族。他們什麼時候能徹底懂得新耶路撒冷，新天新地的預言呢？讓我們拭目以待。

希伯來精神和中國精神

2014“向上·向善”中國青少年微電影大賽落幕時，《我的成人禮》獲最佳影片和最佳攝影獎（見“新華網”報導，20150118）。這部不足半小時的短片不但扣人心環，而且感人肺腑。如此暴露黑暗的“悲劇”獲獎，也許反映了評委的感受：“向上·向善”必須以“嫉惡如仇”為起點。

老子（公元前604-531年）曾經說，“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告子（約公元前420-350年）分析說，“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孟子（公元前372-289年）不以為然，回答告子說：“水性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頽；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人心之善惡，特別是人性

之善惡，是現代學者頗感興趣的問題。現代資深儒學家傅佩榮提倡“人心向善論”，認為，當孟子所言“人性之善”和“水之向下”合拍，就產生“人心向善”的意思。

推敲傅氏美意之時，不由矚目孟子的下半句：“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頽；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溫文爾雅的哲學家孟子，忽然激動起來，用詩句和科學語言來描寫，當水受到壓力，能夠向上倒流到山頭。原來，水沒有了不得的智慧，無非因地心引力而下，因反引壓力而上。所以，隨流向善之人，受一些些誘惑，就“可使為不善”。在二十一世紀這個無惡不有的時代，孟子的名言改為“水無有不下，人無有不惡”似乎更合乎現實。

聖經記載的希伯來人，似乎沒有孟子所描寫的那種“人心向善”的美好經歷，倒反桀傲不順，將上帝所賜的特殊恩典當作賭注，直到家破人亡。這批“向上之民”流落他鄉時，還剩下的，無非是諸如約旦河河水截停、向上倒流的史話（約書亞書4章），“上”耶路撒冷途中所唱的“向上行之歌”（詩篇120-134篇）和在敬拜時向上帝所獻的“向上行之祭”。這個在上帝面前累累桀傲不順的民族，今天被眾敵人包圍之時更是桀傲不順。

最後，讓我們回到魯迅先生的思想世界。在軍閥混戰、中國何去何從時期，他在一篇散文中留下一句令人深思的話：“我們極容易變為奴隸，而且變了之後，還萬分喜歡。”（《燈下漫筆》，1925年）。魯迅對國人幾千年來養成的奴才本性——缺乏反抗性：自己被人吃，但也要吃別人——感到十分痛心。希望讀者能把魯迅這篇短文找來一讀，以彌補筆者缺乏篇幅、無力表達之不足。

回顧國人被（北）魏、金、元、清所服貼奴役的歷史，魯迅似乎對日寇模仿金元清、奴役中國的算盤有所預感。幸好有魯迅這一輩的硬骨頭，國人多少頭顱落地也沒有再次淪為奴隸；魯迅所描寫的“人肉的筵宴”得以中斷。如果魯迅能夠看到二十一世紀國人沉迷於《XX傳》這般奴才文化的境況，買官鬻爵、賄上掠下的風氣，不知他會寫出怎樣的《破惡聲論》和《燈下漫筆》了？

“向上文化”與“奴才文化”針鋒相對；“向上之民”與“向下之奴”格格不入。魯迅和普藍克遠隔萬里、同時提倡希伯來精神，要仰望那位“無限絕對之至上者”，免得在絕望時說出“時日竭喪，予及汝偕亡！”這樣痛心的話。Ⓟ

作者曾獲得數學、神學等學位。本文於甲午除夕脫稿於旅途中。

基督教與法治的發展

周鐵樓



2014年初台灣學生發起的「太陽花運動」，和後來由香港學生領導的「雨傘運動」，促使我作了一點探討，發現基督教對自由、民主、法治的發展有很大的貢獻。

觀察這兩次學運，我認為香港學生較令人欽佩，他們的政治訴求和對理想的執著已經清楚表達，且能讓執政當局理解。可是台北的學生衝破行政院，又佔領立法院24天，顯示比較缺乏民主素養，尤其是法治（rule of law）的觀念。

法治與中西文化

一個現代國家必須具有自由、民主、法治的三大基本要素。自由是法律限定內不妨礙他人的自由；民主是一人一票，在自由意志下少數服從多數的決議；法治是人民在法律公平治理下，遵守法律，以守法為榮。

中國人談論民主與自由已經多年，至少可以追溯到五四運動時代，但卻很少談法治。中國人為什麼缺乏法治觀念呢？這與傳統文化有關。中國傳統文化是由儒、釋、道三大思想匯集而成，其中儒家思想是主流。中國人接受孟子的性善說，“性本善，習相遠”，認為可以從教育來教導變壞的人走上為善之道，因此儒家不太注意法治觀念。道家崇尚自然，當然不要外力（法治）的約束。佛家注重個人修行和“西天淨土”，自然也沒有法治的觀念。數千年來，中國一直實行人治，尊權而沒有法治觀念，所以也沒有建立法治制度（法治，rule by law）。

西方文化則是由希伯來、希臘、羅馬文化匯合而成。希伯來文化提供了宗教思想，希臘文化提供了民主思想，羅馬文化提供了法治觀念。西方的觀點簡言之為：人是神按照祂自己的形像樣式造的，

人性原本是善的；但始祖受了引誘吃了禁果因而犯罪，後代子孫都生而帶有原罪；人性變惡了，所以要有律法約束人的行為，維持社會秩序。西方因而建立了法治社會，法律之下人人平等，人人都要受法律的約束。

法治與民主、自由

民主是法治的前提和實質內涵之一。法律一定要透過民主機制制定，它對政府和人民同樣有約束力，要求政府和人民共同尊重和遵守。

談法治與民主，離不開自由，因為只有全體人民都有自由表達自己意志的權力時，民主才是可能的。所以有人說，法治是自由之父與民主之母結合的結果。

經由民主機制而制定的法律，是民主與人權的保障。亦即是說：民主與人權的保障是通過實質法治體現的。民主與法治不能相離。若只有民主而沒有法治，可能流於變相的專制或暴民政治，如1789-1799年的法國大革命，那是一段沒有法治的時期，社會和政治動盪而恐怖。

美國1776年獨立革命卻是由尊重法律和有信仰的人所提倡；中國推翻滿清王朝的革命，也是由尊重法律和有信仰的孫中山先生所發起，使革命運動和民主、法治融合為一。

如果法律是由一個專制的政黨所制定，那麼它與民主、法治就沒有多大關係。

基督教與法治的建立

中國知識界一般認為，西方民主政治的起源來自古希臘的城邦政治，但實際上從民主政治的發展史來看，希臘的貢獻遠不及基督教的影響。

從康士坦丁大帝把基督教定為羅馬帝國的國教開始，基督教的觀念就影響政治。聖經經文的一

西方社會通行的自由和權利學說，在很大程度上是基督教影響的結果。

The concept of freedom and human rights becoming popular in Western society was largely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Christianity.

部分被用來為統治者服務，如“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他，因為沒有權柄不是出於神的。凡掌權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權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罰。”（羅馬書13：1-2）但基督教教義的某些內容，如：神看人人平等、彼此相愛和愛人如己等等，對於近代自由、民主、法治觀念的發展和形成都產生影響。

1. 基督教與自由平等

首先，我們看基督教與自由平等觀念。申命記說：神“不以貌取人”（10：17），羅馬書說：“……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3：23）。從這兩節經文來看，世人在神的眼中都是平等的，且都同樣是墮落有罪的人。

約翰福音說：“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3：16）。加拉太書說：“並不分猶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為奴的，或男或女，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裏都成為一了”（3：28）。因此，墮落有罪的人若悔改，信靠神的兒子基督耶穌，就獲得永生，且真正平等，甚至奴隸也同樣能得救，可以與自由人一起參加教會的崇拜、聖餐，和其他活動。

早期基督徒的平等觀念雖然局限於教會內，但由於基督徒與不信的人接觸交往，平等待人也慢慢成為社會人際的正常關係。

1642-1645年英國內戰時，國會內的清教徒擴大了平等觀念，認為所有基督徒都是自由平等的，因此有權在一個基督教國家的事務上發表言論，這就把教會內的平等擴大到教會外的政治事務。北美新英格蘭地區的清教徒繼續發展這種平等觀念，後來寫入了美國的憲法。

西方社會通行的自由和權利學說，在很大程度上是基督教影響的結果，如英國的洛克、法國的孟德斯鳩、和美國的傑斐遜和麥迪遜等人，都從基督教基本教義推導出自由和權利觀念。

2. 基督教與法治觀念

其次，我們看基督教與法治觀念。申命記說：“人無論犯甚麼罪，作甚麼惡，不可憑一個人的口作見證，總要憑兩三個人的口作見證才可定案。”（19：15）這可說是開法治之先河。統治者或官員不能任意地監禁犯人，要有兩個人見證他犯法才可以。新約聖經在處理教會事務上，也同樣提出要有兩個見證人的要求。如今在歐美等法治國家，法庭都要求必須有証人作証。

許多學者指出，當今不少法律是從十誡來的，

如：第五誡孝敬父母乃是家庭神聖化的一則强有力的法律；第七誡不可奸淫是透過不可通奸來強化保護家庭的法律；第八誡不可偷盜認可了私有財產；第九誡不可作假見證禁止偽証，並建立了以宗教為基礎的訴訟。德拉普金（Israel Drapkin）教授在《古代的罪與罰》一書中總結說，十誡是西方文明道德的基礎。

十誡之所以能傳遍世界，當歸結於康士坦丁大帝把基督教定為國教，羅馬的法律開始遵從聖經的原則。大部份歐洲國家也相繼成為基督教國家。



現今法治的一個基本原則是：沒有人能凌駕於法律之上，包括國家領導者。這是如何達成的呢？在基督教歷史上，主後390年發生一件

大事。一些民衆在帖撒羅尼迦發動暴亂，基督徒皇帝狄奧多西大帝反應過激，屠殺了7000人，其中大多數是無辜者。米蘭主教安布羅斯以神的名義要求皇帝對其殘殺行為做出懺悔。皇帝拒絕，於是，這位主教便把皇帝驅逐出教會。經過一個月的煎熬，皇帝最后匍匐在安布羅斯的教堂前懺悔，信徒們都喜極而泣。當時所用的至上原則是：神法高於人法（與今天以人間法律為至上的原則有所不同），這件事成了約束君主行為不得凌駕於法律之上的經典案例。

另一件具有決定性影響的事件，是1215年6月15日英王約翰所簽署的自由大憲章。他在封建領主、教士、騎士和城市市民的聯合壓力下，簽署了這份共計63條的憲章，主旨是限制王權（最高權力受到法律限制），保障教會、領主、教士、騎士和市民的權益。大憲章導言寫道：“約翰，靠神的恩典……”，並且指出大憲章的形成乃出自“對神的敬畏，為了我們的靈魂……的救恩，為了神的榮耀……”，可見大憲章的成果與基督教密不可分。

3. 基督教與民主機制

人權和法治的建立，必有賴於民主機制的運作。基督教也影響了這方面的發展。

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糾正了天主教在教義上的錯誤，但路德宗仍保留了天主教的儀式和機制。隨著宗教改革在歐洲的蓬勃發展，許多信徒和新

聖經裡的愛、自由、平等、人權、契約精神、法治精神等，深深地影響了歐美現代民主國家的發展與成長。
The biblical ideas of love, freedom, equality, human rights, covenant, rule-by-law, etc., profoundly impacte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democratic countries in Europe and America.

教會迫切尋求符合聖經的儀式和機制。加爾文在著名的《基督教教義》（*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中提出了基督教應有的機制。他主張教會內部應尊重民主過程。長老（監督）和執事應由教會會眾選舉；會眾大會要定期舉行，讓會員表達他們的關切，推動他們的建議；容許信徒自由加入和離開教會。

加爾文指出，教會這種結合法治、民主過程、和個人自由的做法，應該也可適用於國家，但他沒有發展出一套政治理論。新教（基督教）各宗派，除了路德宗，或多或少都採用了加爾文提倡的儀式和機制。

現代民主是間接民主，國家領導者總統雖由全國公民選出，但立法議員是分區選出，代表該區人民。間接民主的代議制多少是受了加爾文的影響。

4. 基督教與美國的法治

美國的獨立宣言和憲法是民主政治發展進程的一個里程碑，其中也反映出基督教的影響。

獨立宣言稱“……人人生而平等，他們都從其造物主那裡獲贈了某些不可讓渡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才在人民中間成立政府。而政府正當權力乃得自被統治者的同意。……”顯而易見，獨立宣言所訴求的公理，是從基督教的基本教義出發。獨立宣言的起草人湯姆斯·傑弗遜自稱是真正的基督徒。

美國憲法的基本精神也有基督教的根源。憲法主要的起草人詹姆士·麥迪遜也是基督徒，深受法國基督徒和歷史學家孟德斯鳩三權分立思想的影響。他在憲法中確立行政、立法、和司法三部門相互牽制與平衡。

孟德斯鳩說，“假如司法權不獨立於立法權和行政權，就無自由可言。”政府不同權力部門之



間牽制與平衡的思想，當然不是基督教的教義直接表達的內容。但是，孟德斯鳩說，他通過對歷

史經驗的總結，認為基督教的基本教義和所培育的觀念，可以為三權分立提供重要的思想和政治文化的依據。以賽亞書告訴我們，在神，三權是歸一的：“……耶和華是審判我們的（司法），耶和華是給我們設律法的（立法），耶和華是我們的王（行政）”（33:22）。但人不是神，人性是敗壞的，擁有權力的人在一定程度上都不足以依賴，所以這三種權力必須分立，相互牽制與平衡，避免獨裁政權的發生。

天主教與新教的差異

在以上的討論中，我籠統地用基督教（Christianity），並沒有區分天主教（Catholic）和新教（Protestant）。天主教和新教對民主法治政治發展的影響是不同的。天主教的體制是權威性的，而封建君主制的舊體制相當照顧到天主教會的利益，因此，起初天主教並不歡迎變革。教皇格列高理十六世在1832年的通諭中反對選舉的議會、表達自由、良心自由和政教分離。

但是，政教分離乃是聖經清楚指示的。耶穌基督說，“該撒的物當歸該撒，神的物當歸神”（馬太福音22:21），這句話剝離了政權的宗教權威性，限制了君王成為神在地上的代表的可能性（如：中國的天子）。使徒彼得也說：“順從神不順從人”（使徒行傳5:29）。這就導致西方基督教國家政教的分離，避免了東方的絕對專制君主。

天主教對民主法治政治的認同，是後來慢慢跟上的。天主教態度的轉變和調整既非本文的主題，也不是才淺學疏的筆者可以說得清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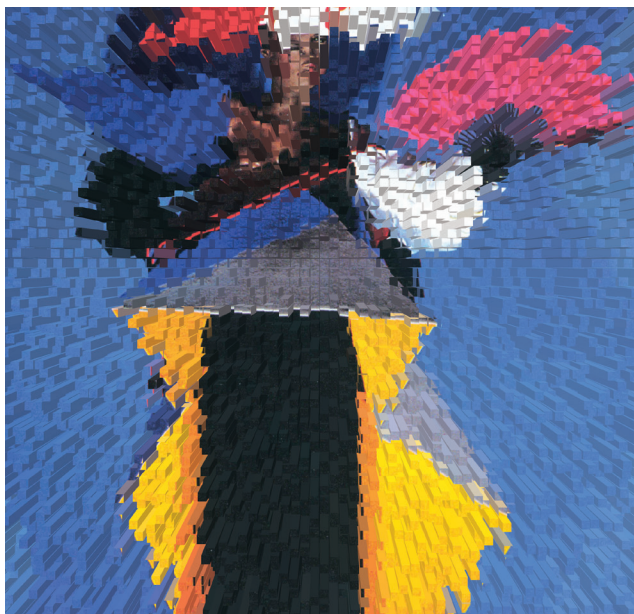
小結

從以上簡單的敘述，我們看到聖經裡的愛、自由、平等、人權、契約精神、法治精神等，深深地影響了歐美現代民主國家的發展與成長。

今天中國人民仍在引頸盼望真正的自由、民主和法治，而如何使中國也成為一個現代民主國家，有一條路很清楚，就是將已在中國扎根的基督信仰成為中國人的主流信仰！

基督教神學可補中國文化不足之處，使自由、平等、人權、契約精神、法治精神等深入人心。作為中國信徒的我們，理當義不容辭地負起這項偉大的使命：使中國同胞作主基督耶穌的門徒（參馬太福音28:19），讓神的救恩遍臨中華大地！✝

作者曾任加州大學物理系主任，現已退休



後現代氛圍下看 神學與教牧

莊祖鯤

所謂「後現代主義」，從某個角度來說，是對自十八世紀「啓蒙運動」以來壟斷主流思想的「現代主義」的一種反彈。現代主義是以「理性」掛帥，強調真理的絕對性，認為只有透過客觀、理性的探討，才能確認何為真理。然而後現代主義卻對這些基本觀念提出質疑，甚至全盤否定。後現代的思想家認為，所有的「真理」都是相對的，即便是科學，也無法排除科學研究者主觀好惡的影響。因此，他們否定真理的絕對性，強調多元主義，肯定以主觀、感性的途徑探索真理的必要。

過去兩百年來人們視為理所當然的觀念，如：「理性是檢驗一切真理的依據」、「主觀的體驗不可靠，惟有能經得起客觀驗證的才是真理」、「科學是絕對的真理」等等，後現代思想幾乎將之完全顛覆。難怪許多人覺得現在的世界「亂了套了」。但是，從正面的意義來看，後現代思想將人類由「泛科學主義」的窠臼中解脫出來，使人不再自我設限於所謂的「純理性探討」，亦是一種貢獻。

在基督教圈子裡，受後現代思潮影響最深、最早的，乃是神學。因為任何思潮都是先由學術圈裡開始醞釀，然後才逐漸影響到社會大眾。所以，「後現代」現象固然是這二、三十年才受到教會界的注意，其實早在一百多年前，這思想已經開始影響基督教的神學發展。

以下簡述神學如何先受到理性主義衝擊，又被後現代主義所左右。

啓蒙運動與自由神學

當啓蒙運動及理性主義在歐美獨領風騷時，

基督教的神學思想自然深受其影響。首先出現的是所謂「自然宗教」的自然神學（Deism），英國哲學家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可算是始作俑者。自然神學一方面強調神的存在及道德律可以用理性來論證，但另一方面則否定以聖經及教會信條為骨幹的「啓示宗教」。對他們而言，神蹟及預言的應驗不合乎理性，因此都是迷信或無稽之談。

但有些人不滿自然神論者將宗教變成淡而無味的哲學，於是另闢蹊徑。有「現代神學之父」稱號的士萊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1768-1834），就是最典型的代表人物。他雖然強調宗教體驗，但卻鄙視他認為不合時宜的教條和教義。他基本上否定一切超自然的事件，如神蹟及耶穌的道成肉身，也否定代禱的功效。後來的自由派神學家都採用他的觀點及思路。他們共同的特色是：

- 完全認同性質主義的觀點，且想按照現代知識來重建基督教信仰。
- 強調每個人都有批判和重建傳統信仰的自由。很多人因此背離了傳統信仰的教義。
- 側重基督信仰的實際和倫理層面，因此後來發展出所謂的「社會福音」。
- 因著聖經批判學（*biblical criticism*）的研究，否定聖經是超自然的啓示。

換句話說，自由神學將神的「超越性」（transcendence）一筆抹殺，只一味強調信仰的「臨在性」（immanence）。李察·尼布爾（Richard Niebuhr）曾一針見血地批評道，自由神學的基督教乃是「一位沒有義憤的神，在一位沒有十字架的基

在卡爾·亨利的呼籲及領導下，一批持守傳統信仰的神學家也開始積極參與神學的討論，他們被稱為「福音派」。Through the leadership of Carl Henry, a group of conservative theologians began to participate in academic discussions. They were called the Evangelicals.

督的協助下，將沒有罪的人帶入了一個沒有審判的國度。」

後現代思潮與「新正統神學」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敲響了現代思潮的喪鐘。啟蒙運動所帶來的樂觀主義、古典自由神學及社會福音，都一併被掃除殆盡。隨之而起的，是後現代思潮，在它的孕育下，產生了二十世紀風雲一時的「新正統神學」（Neo-Orthodox Theology）。

其實，新正統神學是受到一位沒沒無名的「憂鬱的丹麥人」祈克果（Soren Kierkegaard, 1813-1855）思想的啟發。祈克果反對當時的主流觀點，即理性足以回答關乎生命的宗教問題。他認為，真理不是非人格的，不是藉著不動感情的理性思考可以獲得的。因此，追求真理的起點不在於置身事外地、「客觀」地去思考宇宙的問題，而應當主觀地從各人生活的情境中開始去探索。所以，作基督徒乃是意味：當理性走到盡頭時，我們願意用「信心的跳躍」（leap of faith）來冒險。

因著祈克果強調從生活情境中去體驗宗教、探索生存意義，後人將他與德國哲學家尼采並列為「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的先驅。存在主義是後現代思想的潮流之一。世俗的（或無神論的）存在主義無可避免會走向灰色、悲觀、極端自我中心的虛無主義死胡同。法國的沙特便是其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名言是：「人生就是個死谷」。而以基督教為基礎的存在主義，卻成為新正統神學的起點。

巴特（Karl Barth, 1886-1968）不但是「新正統神學之父」，也是二十世紀最有影響力的基督教思想家。他是瑞士人，受教於德國自由神學的諸位名師之下。但是當他牧會時，發現自由神學對民生疾苦只是隔靴搔癢。再加上在1914年，他的神學教授幾乎都簽名支持德國政府的戰爭政策，在心靈的徬徨及震撼之下，他開始再思自由神學的謬誤。1919年他出版《羅馬書註釋》，此書讓他一夕成名，也為十九世紀古典自由神學劃下了休止符。

巴特重新強調神的超越性。他承認，他是受到祈克果所強調神「全然不同之相異性」（wholly otherness of God）的觀念所啟發。祈克果認為，人的理性必然無法完全理解神，所以面對神自我啟示的弔詭性真理（或悖論，paradox），在人類有限的心思下，我們只能藉信心的跳躍來擁抱它。因此巴特強調：神、福音、永恆與救恩等偉大的真理，都是與人的經驗或理性全然不同的，我們必須以順服

的態度接受這「從上而來」的啟示。

巴特與自由神學家的觀點背道而馳之處為：他重新肯定聖經是基督教神學的唯一資源。但是他對聖經的觀點卻引起許多爭議與批評。自由神學家認為，他退回到傳統的「字句靈感論」去了；基要派則攻擊他否定「聖經無誤論」。事實上，巴特的確是認同高等批判理論的，他也不認為聖經就等於神的話。但他認為，聖經中「包含」了神的話，而且聖經在某個事件中對我們「成為」（become）神的話。

巴特與一些神學家，如卜仁納（Emil Brunner, 1889-1966）、布特曼（Rudolf Bultmann, 1884-1976）等人，既不完全接受傳統信仰的教義和聖經無誤的觀點，也不認同自由神學的理性至上論。因此，他們折衷的立場被列為「新正統主義」。

到了六〇年代以後，許多比新正統派更激進的神學潮流開始興起。雖然這些神學流派各有不同，但是他們都同樣深受後現代思潮及存在主義的影響，強調信仰的「當下」意義，也都否定理性在宗教探索上的功用，而強調以主觀情境化（contextualization）的體驗來代替，以致產生了種種所謂「情境化神學」，諸如「黑色神學」（Black Theology）、「女性神學」（Feminist Theology）、「解放神學」（Liberation Theology）等。還有些派別否定啟示性真理的存在，拒絕承認基督教福音的獨特性，而肯定多元主義的宗教觀。「進程神學」（Process Theology）便是一個例子。

福音派神學的奮起

十九世紀自由神學風起雲湧時，大部分主流派神學院都落入「新派」的掌握之中。因此，許多保守派神學家紛紛離開這些神學院，另外組成聖經學校及神學院，想與新派的神學院分庭抗禮。但是這些被稱為「基要派」（Fundamentalist）的保守派神學院，無論在人數上或學術水準上都無法和新派的神學院相提並論。而且可惜的是，這些基要派的神學家大多數以維護信仰的「純正」為理由，採取自我隔離的態度，拒絕參與各種神學思想的對話或討論，以致於在社會主流思想中銷聲匿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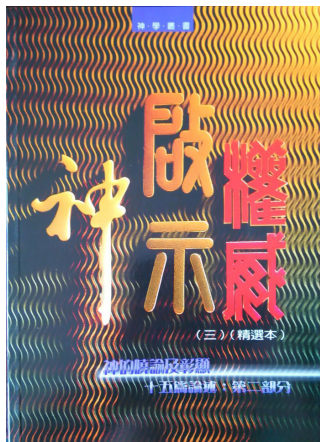
但是從1950年代開始，情勢有很大的轉變。在卡爾·亨利（Carl Henry）的呼籲及領導下，一批持守傳統信仰的神學家也開始積極參與神學的討論，他們被稱為「福音派」（Evangelicals），以與早期的基要派有所區別。

經過四、五十年來的努力，如今福音派神學院

人際關係的疏離感，是現代工業社會的特徵，也是現代化教會常有的現象。On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industrial society is the alienation of human relationship. The modernized church often reveals the same feature.

已經成長茁壯，不再是吳下阿蒙了。據統計，1960年全美國人數最多的十大神學院，除了四間浸信會的神學院外，全部是新派的神學院。但是到了1990年，十大神學院中只有一、兩間是新派的，其他都是福音派的，如：三一神學院、富樂神學院、達拉斯神學院及四間浸信會的神學院。因此福音派的神學思想不但已經在基督教神學界取得一席之地，甚至已經逐漸佔有主導的優勢。

卡爾·亨利的代表作是《神、啓示、權威》，在書中他深入分析現代神學的弊病，並為福音派神學的方法論建立根基。他強調神的啓示及聖經的權威性，因為聖經掌握了一切基督教教義。這也正是福音派最中心的關注。與新正統派不同的是，福音派堅持聖經的「靈感論」與「無誤論」，因為聖經的重要性在於「它將神透過話語啓示的真理形成經文」。



另一位福音派神學家蘭姆 (Bernard Ramm)，不但依靠聖經，也仰賴教會偉大的神學傳統，如教父時期和改教時期的作品。但是他堅持要以開放的心胸及理性的思考，來進行嚴謹的神學思考及護教。他指出，根據聖經與聖靈內在的見證，信徒應該可對個人得救充滿屬靈的確信 (certitude)。然而對客觀的歷史、事實等聖經啓示的依據，雖無法確知 (certainty)，卻可視為「可能性極高」。他也認定，合宜的護教學必須依據啓示，也就是根據神的創造、人的本性、以色列史、教會歷史、聖經內容、神在基督裡的道成肉身，以及福音在信徒心中的自我彰顯。

所以，後現代主義固然對基督教信仰造成衝擊，但其實它也為神學開啓了新機。因為現代主義的崩潰，使我們確知：人類不可能將地球變成天堂。但是那位「外在而超越」(there and then)的神，既向我們說話，也在此時此地 (here and now) 與我們同在。藉著祂，信徒有可能將「地上」變成「如同在天」。這就是基督教的信仰所帶來充滿希望的信息。

因此，在從「現代」過渡到「後現代」的時期中，神學有機會提出新見解，用新的方式表達基督

徒對「既超越又臨在之神」的信念。

後現代教會的特色

當下的社會深受現代科技與理性思想影響，人們不約而同都強調工作效率與績效，因此「節目」(program) 成為受關注的焦點。在這種環境下，教會很自然也講究效率與組織。教會每一年都要訂出增長的「量化指標」，牧師成為教會的「執行總裁」(CEO, Chief of Executive Officer)。教會各部門的活動琳瑯滿目，把行事曆填得滿滿的。主日崇拜的聚會更是排得十分緊湊，而牧師最容易被信徒和同工指責的，就是講道超過時間。

有些教會則極其看重教義的「純正」。在美國，許多這種類型的福音派教會採取「解經講道」的方式。另外，現代化的教會強調分工，以致教牧同工有時變成只是「同事」關係，而非「弟兄姊妹」。這種人際關係的疏離感，是現代工業社會的特徵，也是現代化教會常有的現象。

後現代的社會注重感性多過於理性，人們珍惜個人主觀的經驗，也樂於分享這些經驗。因此，許多超自然的、神秘的經驗，不再成為禁忌，反而是人們津津樂道的話題。由於現代社會造成人際關係的支離破碎，後現代社會的人更重視「關係」的建立，強調「過程」(process) 而不僅是「結果」(result)。

當代許多比較偏向靈恩的教會是具有這種「後現代」色彩。他們的聚會喜歡採用熱情洋溢的「敬拜讚美」，唱詩的時間很長，有時比講道還長。崇拜方式比較不拘形式，可以臨時加入見證或禱告。有些教會甚至在牧師講道完之後，立刻請會眾回應。一般而言，這種教會講道時間較短，信息內容強調「切身感受」(felt needs) 及如何與生活相關 (relevance)。同時，這種教會的信徒比較重視「現世」(here and now) 的需要，而非「終極關懷」(ultimate concern)。會眾對教會的委身程度相對較低，甚至有「反組織化」(anti-institution) 的心結，所以常常遊走於眾教會之間，成為「游牧民族」。

美國以調查基督徒社會現象聞名的巴納 (George Barna)，在2001年底列舉出當代美國教會的狀況，¹ 其中有許多與後現代思潮有關係：

· 35歲以下的年輕人中，很少人採取聖經的觀點看事情。

· 聖經的教導與價值觀對人們道德的選擇影響很小。人們關心的是如何避免麻煩及減



少衝突。

· 美國人當中相信有絕對真理的人數，已經由2000年1月的38%，急速掉到2001年11月的22%。

· 預期到2010年，有五千萬人只會在網路上去尋求「靈性的經驗」，而不會去教會。

· 有30%自稱是重生的基督徒認為，同居、同性戀、看色情電影都是可以接受的。

這些都反映出後現代思潮已經逐漸對教會的信徒產生影響。因此要如何去牧養這些後現代社會的信徒，將成為牧者的一大挑戰。

後現代教牧關懷的急務

李耀全牧師曾引用英國學者古德立夫（Paul Goodliff）的觀點，提出四個「後現代教牧關懷的急務」²：

1. 建立基督徒的群體

現代社會過份強調「個人主義」，連教會也是如此，缺乏真正的肢體關係。因此每個人都成為「孤島」，自然容易被魔鬼各個擊破。我們需要重建溫馨親密的基督徒群體（community），才能共同面對生活上及信仰上的挑戰與衝擊。

2. 培育健康的人際關係

由於社會大環境的影響，許多人的「自我形象」（self-image）及「自我價值」（self-esteem）很差，導致人際關係不健康。當然，正確的「自我價值」必須從信仰上去重建，體認自己是個蒙恩的罪人，然後才能重建健康的人際關係。另外，過去中國的政治鬥爭太多，在「批鬥文化」的薰陶下，許多國人習慣於用「批鬥」方式來處理夫妻的矛盾及其他人際關係，以致於衝突越演越烈，終至不可收拾。

3. 醫治受傷心靈

現代人由於種種原因，心靈受傷甚至成為精神病患者的比例逐年高昇。因此有些教會的牧師幾乎放棄祈禱傳道，而成為「心理治療師」了。這不太正常的現象突顯出醫治受傷心靈的迫切需要。但問題是，許多牧者在從事「教牧協談」時，往往會不加思索地採用世俗的心理學家的理論與方法，卻沒有考慮到這些心理學理論是否與信仰有衝突？他們的假設前提是否合乎真理？因此，如何適當地結合聖經真理與心理學，是我們必須先處理好的問題。

4. 培養真切持久的信仰

幫助信徒在信仰上紮根，是牧者的首要責任。否則面對一群支離破碎的老弱殘兵，牧者一定會像忙著趕羊的牧羊犬一樣疲於奔命。要如何去培育信徒的靈命？則是一個亟待探索的老問題。近代福音派教會開始注意到「靈修神學」的重要性，有些人在推廣，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方式。

後現代教會教牧關懷的芻議

針對後現代社會的特性以及其弊端，我建議下列一些對策，作為回應。

1. 強化團契或小組的功能

傳統上，華人教會的團契或小組最主要的活動是「查經」，偏重教導的功能，與主日講台及成人主日學的教導功能有些重疊。最近流行的「小組教會」則強調小組的傳福音功能，講求快速分裂增殖的績效。

其實團契或小組的最主要功能，應該是牧養關懷。至於教導及傳福音，則應該是副產品，而不是主要功能，不要本末倒置。對教會牧者而言，團契、小組是教牧關懷的「網路」（network），可以協助落實關懷的工作。同時，這些團契、小組也是他需要費心去培育的「基督徒群體」。約翰衛斯理在早期就將他的信徒組成小「班」，在「班」裡面，信徒要定期彼此交代自己的信仰生活現況。這種小組是後來循理會能快速成長的原因。

2. 全面而深入地教導聖經真理

後現代的信徒喜歡陶醉在詩歌的旋律中，而不喜歡聽長篇大論，但真理的膚淺正是他們容易被異端邪說誘惑的原因，所以需要對症下藥。保羅提醒提摩太：「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專心。並用百般的忍耐，各樣的教訓，責備人、警戒人、勸勉人。因為時候將到，人必厭煩純正的道理，耳朵發癢，就隨從自己的情慾，增添好些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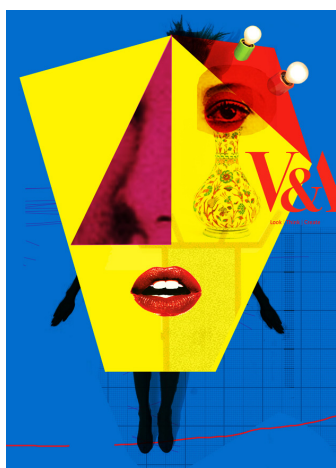
我們要分別：什麼是傳福音的「切入點」？什麼是我們要引導眾人到達的福音「終點」？
We have to find out the entry point and the terminal point of evangelism.

傳。並且掩耳不聽真道，偏向荒渺的言語。」（提摩太後書4:2-4）


既然要全面教導聖經，主日講台更應該以「解經講道」的方式來傳講，使信徒能對聖經有全面的瞭解。現代許多器材設備亦可以幫助表達方式更活潑有效。另外，成人主日學也可以加強，使信徒養成終身學習的習慣。但是如何去實踐、去經歷所學習到的真理，才是成敗的關鍵。否則只有「知識」，沒有恩典的經歷，仍然是不平衡。所以彼得勸勉我們：「要在我們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和知識上有長進。」（彼得後書3:18）

3. 兼顧現世與終極的需要

我們不能漠視人們現世的需要，否則就成了雅各所責備的那些有「信心卻沒有行為」的「虛浮的人」，福音也就成了曲高和寡的高調。但是，我們也不能只遷就世人短視的眼光，去滿足他們現實的需求而已。我們應該向他們指出：什麼才是他們真正的需要？引領他們去追尋永恆的價值。所以我們要分別：什麼是傳福音的「切入點」？什麼是我們要引導眾人到達的福音「終點」？我們需要更整全的福音信息及福音策略。



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Abraham Maslow, 1908-1970）對人類基本需要的研究（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及自我實現需要，依次從最低到最高層級），或許可以給我們在研擬福音策略時得到一些啟發。

後現代是漂浮不定的一代，隨心所欲去追求理想或美夢。他們也是迷惘的一代：沒有標準、沒有是非、沒有標竿、沒有終點。他們並不知道自己到底在追求什麼。他們會像《傳道書》所說，至終發現「虛空的虛空，一切都是虛空」。求主幫助我們，預備好去牧養他們！

作者在波士頓牧會

註：1. “The Year’s Most Intriguing Findings, From Barna Research Studies,” Dec. 17, 2001, Barna Research Online, www.barna.org. 2. “後現代的教牧關懷”，建道神學院《教牧期刊》，第九期，2000年五月。

索閱單

（請複印後填寫，寄回本刊）

稱謂 Mr. _____ Mrs. _____ Ms. _____ Rev. _____

收件者（中文）_____

(Name) _____

(Address) _____

(City) _____ (State) _____ (Zip) _____

(Tel) _____

(e-mail) _____

以下項目歡迎索閱，並自由奉獻。請酌增郵費。

雜誌／期刊

____ 恩福雜誌從第____期開始（一年四期成本約15美元）

____ 《基督教與中國》（每輯建議奉獻8元）

第一輯 ____本 第二輯 ____本 第三輯 ____本

第四輯 ____本 第五輯 ____本 第六輯 ____本

書籍

____ 《恩福靈筵—馬太福音》 ____本（建議奉獻12元）

____ 《恩福靈筵—使徒行傳》 ____本（建議奉獻10元）

____ 《恩福靈筵—羅馬書》 ____本（建議奉獻8元）

____ 《恩福靈筵—哥林多前書》 ____本（建議奉獻9元）

____ 《恩福靈筵—啟示錄》 ____本（建議奉獻10元）

____ 《跨越傳統尋真理》 ____本（建議奉獻15元）

____ 《文化宣教面面觀》 ____本（建議奉獻20元）

____ 《宇宙本體探究》 ____本（建議奉獻20元）

____ 《聖經遇見小故事》 ____本（建議奉獻10元）

____ 《穿越科學的迷霧》 ____本（建議奉獻15元）

____ 《生命的U-Turn》(繁) ____本（建議奉獻10元）

____ 《生命的U-Turn》(簡) ____本（建議奉獻10元）

____ 《中西文化精神與未來走向》 ____本（建議奉獻25元）

____ 《中國現代化視野下的教會與社會》 ____本（建議奉獻20元）

____ 《基督教文字傳媒與中國近代社會》 ____本（建議奉獻30元）

____ 《基督教與社會公共領域》 ____本（建議奉獻15元）

____ 《談天說地》 ____本（建議奉獻20元）

____ 《中國基督教研究》 ____本（建議奉獻10元）

____ 《中國基督教研究》 ____本（建議奉獻10元）

影音產品

____ 恩福佈道培訓系列 DVD（建議奉獻20元）

第一套 ____ 第二套 ____ 第三套 ____

____ 恩福佈道培訓系列 CD（建議奉獻10元）

第一套 ____ 第二套 ____ 第三套 ____

奉獻支票請寫：BCMF

請寄至：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U.S.A.

阿奎那的宇宙論及其現代意義

葛擁華

作為中世紀哲學的集大成者，阿奎那（Thomas Aquinas，約1225年—1274年3月7日）在西方思想史上有著特殊的地位。他不僅吸納和繼承了古希臘羅馬哲學，而且在基督教框架下對之做出了深刻改造，為現代思想奠定了基礎。在理解宇宙的起源和特徵上，阿奎那的宇宙論仍然具有現代意義。



宇宙的起源

宇宙的起源問題包括兩個方面：首先是宇宙的第一因，其次是時間上的起點。阿奎那清楚認識到二者的區別，並做出了獨特的解釋。

1. 宇宙的第一因

自古希臘哲學誕生以來，人們一直試圖回答“宇宙的本原或源頭是什麼？”早期的自然哲學家認為，萬物由某種元質（Urstoff）組成，並將物質元素，如水或火，視為宇宙的第一因（αρχή）。在畢達哥拉斯的影響下，柏拉圖認為，理念“先”於物質，由此更關注宇宙的形式因。亞里士多德雖然提出四因說，但從未將之運用於宇宙整體，他的上帝只是宇宙的終極因。對於這一問題，阿奎那系統地運用四因說來探討宇宙的第一因，將古希臘哲學與基督教的創造論完美結合起來。

就形式因和終極因而言，阿奎那基本採納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立場，證明上帝是宇宙的模範因和終極因。阿奎那超越這二位先哲的是，他進而論證：上帝也是宇宙的動力因。這一論證所依據的基本原則，是柏拉圖的分有說（participation）：如果一個事物部分擁有某種屬性，那麼這一屬性必然源於本質上擁有該屬性的事物，如鐵從火獲取部分的熱，熱就源於火。將這一理論應用於存在，阿奎那得出結論說，一切非自存的事物都從自存者那裡獲取存在，即上帝是宇宙的動力因。

但在宇宙的物質因上，阿奎那與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甚或整個古希臘傳統宇宙論分道揚鑣。物質永恆自存是古希臘哲學的基本共識。柏拉圖在《蒂邁歐篇》中認為，物質本身是永恆存在的，創造者（demiurge）將形式賦予了既有的原始物質；亞里士多德也認為，“無中生有”是不可能的。但阿奎那繼承猶太—基督教思想，強調上帝是從虛無中創造出宇宙。

阿奎那與之前的基督教學者不同之處在於，他沒有將這一結論停留在信仰層面，而是用理性為之做出證明。阿奎那認為，哲學的發展是漸進的，早期哲學家只關注到“存在”的某些側面，而只有在哲學發展到以存在本身為研究對象時，人們才開始意識到，原始物質必然源於萬物存在的起因，即上帝。在此意義上，“從無創有”是哲學發展的巔峰。

接下來，他證明說，上帝是宇宙的第一因，即上帝是宇宙的動力因、模範因和終極因，但創造不需要物質因，因為上帝從絕對的虛無中將萬物帶入存在。

2. 時間上的起點

在古希臘哲學中，宇宙的永恆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在猶太—基督教框架下，這種永恆宇宙論逐漸受到了質疑和批駁。

絕大多數中世紀思想家理所當然地認為，創造必然與永恆宇宙相互衝突。所不同的是，阿奎那承認，依照聖經的啟示，宇宙有時間的起點，但創造概念的本身與永恆宇宙並不必然衝突。原因有兩方面。第一，對於宇宙是否永恆，理性不能給出定論；承認宇宙永恆並不一定否認創造。第二，創造不是變化。變化的前提是有既存事物，但創造是無中生有的。既然時間是對變化的描述，創造就不在時間的維度內。變化是物理過程，創造是形而上學概念。上帝的創造與宇宙在時間上的起點並不同。這也意味著，基督教創造教義與宇宙大爆炸並不是同一回事。這一點在後面有更詳細的討論。

宇宙的特徵

在很大程度上，事物的性質取決於它的起點。

阿奎那的宇宙論以上帝為中心。正因為上帝是萬物的源頭和終點，宇宙才是合一的、美好的、和諧的、有秩序和有目的的。 Aquinas' cosmology is centered around God. Since God is the origin and ending of everything, the universe can be in unity, perfection, harmony, order, and with purpose.

在阿奎那看來，既然上帝是宇宙的第一因，即動力因、形式因和終極因，那麼宇宙必然是善的、有層次的和有目標的。

基督教與靈知主義或摩尼教的宇宙論不同。基督教強調，萬物在本質上都是善的。奧古斯丁認為，既然上帝是唯一的，又是至善的，一切源於上帝的被造物就必然是善的；而既然存在本身是善的，那麼惡就不是一種實存，只是善的缺乏，正如暗是光的缺乏。阿奎那繼承了這一立場，但與之相比，他更為堅定地肯定了物質世界的價值，其宇宙論洋溢出一種特有的開放和樂觀精神。

既然上帝是宇宙的模範因，萬物都在某種程度上映射著上帝的善。但由於單個被造物不足以擔當此任，上帝就創造了不同種類的被造物，透過這整體來更好地映射祂的善。因此，阿奎那認為，宇宙由分屬不同等級、如數字般排列有序的事物構成：物質、植物、動物、人和天使。這些被造物相互連接，形成統一而和諧的宇宙。因為宇宙是合一的、有秩序、有規律，人們才可以認識宇宙，可以通過探索自然來尋求上帝的智慧。這是許多早期科學家研究自然的動力。

由於上帝是宇宙的終極因，所有事物都有目標性。事物的運動不是隨機的，而是受規律的指引，並指向某個終點。宇宙雖然是穩定的，但不是靜止的，因為萬物都處於發展之中。阿奎那指出，“每一個被造物都延伸趨向自我完善，這種自我完善象徵著上帝的完美。”當然，現代科學早已放棄了對事物終極因的探討，但當代天文學表明，宇宙的各項基本常數彷彿被精確地設置過，甚至如果其中任何一項稍有偏離，生命就不可能存在。這種“宇宙微調”現象，似乎為亞里士多德—阿奎那的目的性（teleological）宇宙論注入新的活力。

的確，阿奎那的宇宙論並不像人們以為的那樣完全過時。相反，他對基督教創造教義的精辟論述尤有深刻的現代意義。

創造論與現代科學

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發現宇宙背景輻射以來，宇宙大爆炸理論已經被科學界所廣泛接受，但如何解讀這一理論，卻有著不少爭議。

一些有神論者聲稱，宇宙大爆炸終於為創造論提供了確切的證據，這是有神論的決定性勝利。但是如前所述，按照阿奎那的理解，上帝的創造與世界在時間上有起點並不同。即使我們確定宇宙有時間的起點，這也不一定能證明世界為上帝所造。

在某種程度上，將宇宙大爆炸當做上帝存在確鑿證明的人，無疑將問題看得太簡單了。

與之相反，一些無神論者從純粹自然的角度來解讀，認為宇宙大爆炸可以推翻創造論。比如，在最近出版的《大設計》中，霍金與其合作者論證說，只要存在重力，宇宙的生成就可以自動發生，根本無需上帝的創造。

不過，在阿奎那看來，即使宇宙在時間上無起點，這也不會否定宇宙為上帝所創造。科學規律並不能取消創造，因為創造不是一個物理過程，而是形而上學的概念。即使自然規律能解釋宇宙的產生，但這種物理描述並不足以取代形而上學層面的創造。

進化與創造的關係是近年來爭議不休的話題。自然主義者認為，進化論是對上帝創造論的最徹底打擊，因為既然自然因素可以解釋物種的起源和進化，那麼設計者的存在就變得完全多餘。而為了捍衛創造論，一些有神論者試圖推翻進化論，或提出另一種理論，如“科學創造論”（creationism）等，來抗衡。然而，其實爭論的雙方都立基於錯誤的前設，即：進化與創造相互矛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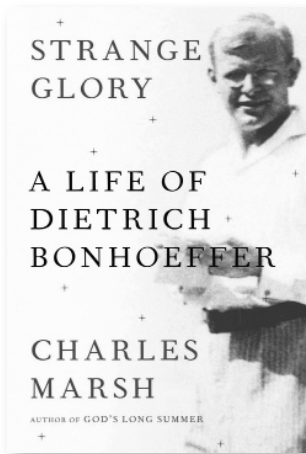
我們知道，只有在同一層面上且屬於同一類的概念才可能相互矛盾，比如一個人不可能同時既是男的，又是女的；但不同層面的兩個概念卻可以並存，如一個人既是男的，又是中國人，二者並不矛盾。在本質上，進化涉及的是變化，而按照阿奎那的學說，創造不是變化，因此創造與進化不可能直接衝突。可見，所謂的“進化—創造衝突論”是基於對創造概念的誤解。在這裡，阿奎那的宇宙論對當代宗教與科學的對話具有指導價值。

小結

整體而言，阿奎那的宇宙論以上帝為中心。正因為上帝是萬物的源頭和終點，宇宙才是合一的、美好的、和諧的、有秩序和有目的的。在很大程度上，這種對自然的理解為現代科學提供了基礎。可惜的是，現代科學發展到如今，反倒失落了目的和意義。

經歷了過度機械性的宇宙論和後現代主義的洗禮，我們或許可以從阿奎那的宇宙論中發掘出新的理解視角和現實希望。 

作者隸屬劍橋大學耶穌學院，本文係該院博士後研究（由Templeton基金資助）的部分成果。



本書榮獲《今日基督教》2014年傳記書首獎

奇特的榮耀（下）

潘霍華的一生

劉良淑摘譯

「這位神的榮耀，是奇特的榮耀。」引自潘霍華1933年倫敦講道

德國牧師潘霍華於1945年被納粹處以絞刑，時值二戰結束前兩週。這位因著信仰而反對希特勒的神學家，所遺留的書信與著作深深影響了這個時代。

作者馬施（Charles Marsh）為維吉尼亞大學宗教研究教授，「活現神學」（Lived Theology）項目主任。

10 1935-1937 新式修道院

1935年4月，潘霍華來到德國北方的海岸小鎮青斯特（Zingst），為「認信教會」成立神學院。沒有青草地、大房子、雄厚的基金；一開始只有簡單的木屋，不過海邊的沙丘倒是靈修的好去處。後來，附近波莫蘭尼亞（Pomerania）有間關閉的傳道人學校可用，有三十畝地，學校很快就緒。這間訓練牧師的神學院，按村名簡稱「芬肯華德」（Finkenwalde）。9月間，有位普魯士的女貴族克萊利周（Ruth von Kleist-Retzow）來參加崇拜，旋即成為學校大力的支持者。

學生很快就察覺，他們不單是在學習如何講道，更是在重新學習如何作基督徒。要作個敢於異議的真信徒，格外需要靈裡的力量，必須深入去禱告、讀經，並認真思想如何應用神的話。

潘霍華把帶領這個團體視為一種藝術，既美麗又嚴謹。每天起床後，師生們安靜地列隊進入大廳，以半小時敬拜神：唱詩讚美、朗讀詩篇、再讀新約、然後禱告（有時用現成的禱告文）、默想，唱詩結束。大家安靜回房，整理內務。

早餐後開始靈修，兩三人一組，先默想聖經，每週深入默想一段聖經，不是為預備講章，而是為揣摩它的真義。然後開始上課，在大廳聽課或舉行研討會。作業也與傳統不同，總有如何應用於當代的問題。潘霍華認真批改學生的講章初稿，再讓學生分小組討論。他也以自己的講道作榜樣。早上的課結束後，休息半小時，再去教堂唱詩。潘霍華認

為音樂是神學的最佳語言。

午餐到下午茶時間可以自由運用；接著是作業時間。晚餐之後常有特別講座或專題討論。潘霍華引進修道院的睡前晚禱模式，每晚九點半開始，約一小時，內容與早禱類似：開會宣召、讀詩篇、唱詩、讀經、回應、讀福音書、禱告、祝福。接著學生要保持安靜，直到上床，「因為神的話不單是每天的開始，也要成為每天的結束。」

這所學校一開始並沒有遭到政府反對。學校所在地的教會為舊普魯士協會，他們表示支持。學生要修一到兩個學期的實用牧會學，包括主持洗禮、婚禮、喪禮、探訪病人、教會財務、節目安排等牧養瑣事。



來這所學校就讀有些冒險，因為潘霍華帶著「異議份子」的標籤。像他這樣的牧師有時被稱為「大冷人」，因為柏林郊區的大冷（Dahlem）有一小群異議牧師，聲稱「認信教會」是德國唯一真正的路德教會。潘霍華認為「下一代的牧師應該完全在教會式修道學院受訓，看重純正的教義、登山寶訓，並認真操練崇拜——這些在當代的大學完全不可能作到」。

潘霍華仍想法子訓練「認信教會」的牧者，同時也開始構思直接抗拒與衝突的辦法。Bonhoeffer would continue to look for other means of training ministers in the Confessing Church - even as he began to consider more direct strategies of resistance and confrontation.

學生當中，小他三歲的貝特格（Eberhard Bethge）成為他的親密摯友，兩人幾乎形影不離。



該學年結束時，潘霍華參照天主教的告解模式，請貝特格作聽他懺悔的人（confessor）。蓋世太保於1937年9月28日把這所學校關掉後，他們兩人一起住在潘霍華父

母家中，直到他於1943年4月被捕。

潘霍華十分喜歡這所學校的模式，不過有些學生對於如此嚴格的靈性生活安排卻不很適應，對他的帶領模式也頗有微詞。有時候他會隨興取消上課，帶大家去草原放鬆心情。他為週末留在學校的學生主持週六早上的崇拜。聖餐每個月舉行一次。他也恢復了路德曾經稱許的一些操練，如：團契中的交談與認罪。有些學生不滿過多的要求和耶穌會模式的氣氛，認為用一小時來默想是一種折磨，因為心思會游蕩、回憶會浮現、夢境再出現、怒氣會爆出。面對學生的反應，潘霍華作了一些調整，也教導學生如何把這些難處化成禱告。

這所學校十分貧窮，沒有錢聘工人，所以學生要作維修校舍和整理花園的工作，用去不少時間。因著籌款的需要，他常來往於學校和柏林之間。學校並不像修道院一般要求學生起誓守貧、不婚、順服，學生可以結婚，也可以隨時離開或回來。整所學校按潘霍華個人對基督徒團體的理想來運作。他鼓勵學生抽時間去休閒，他本人也會躍進波羅的海游泳，他的網球與乒乓球都打得不錯。他要學生稱他「潘霍華牧師」或「弟兄」，但習於拘謹的學生喜歡稱他「校長先生」，而背地裡則戲稱他為「元首」（*der Fuhrer* 譯註：對希特勒的稱呼）！他會在晚餐後與學生們無拘無束地聊天，談他到柏林的種種見聞。不過他並非完人，有時候脾氣也會控制不住。

他把路德的「唯獨信心」、「唯獨恩典」重新從「作門徒」的角度來詮釋。背起十架跟隨主的呼召，意思是門徒應在生活中效忠耶穌，而改革的思想與作風其實乃是正宗的基督信仰。他所寫《作門徒的代價》一書，德文版原名《跟隨我》，內容為「芬肯華德」學校的主要上課內容，在學校被關閉後出版。

1936年2月4日，潘霍華在學生的環繞下過了

30歲生日。7月，約一百位「認信教會」的牧師被捕。8月，奧林匹克運動會在德國舉行，潘霍華對此盛事頗有熱情。然而同月，他在柏林大學客座講師的資格被取銷；他和學術界的聯繫、教會的支持全被停止，他也不可以在「芬肯華德」教書。他繼續帶學生便成為不法。潘霍華受邀到法國單伯利（Chambry）去參加普世教會的大會，但對這個聚會感到相當失望。

1937年夏天，潘霍華在學校最後講了幾堂課，內容後來出版為《團契生活》（*Life Together*），並被翻譯成多種語言。書中說，基督的門徒就像以色列民一般被分散到各地，跟隨耶穌就是過流放生活，註定在世上漂蕩；神的子民雖在天涯海角，但耶穌會與每個人相遇，作他們的朋友同伴。

那年2月，內政部下令：不許因良心而離開國家教會的牧師從事聖職；接著不少認信教會牧師被捕，有人被送去集中營，有人被處死。9月，一隊納粹黑車來到「芬肯華德」，27位學生當月全部被捕；當時潘霍華與貝特格正在巴伐利亞（Bavaria）度假。到12月，德國境內的五所異議神學院都被關閉。

潘霍華仍想法子訓練「認信教會」的牧者，同時也開始構思直接抗拒與衝突的辦法。他採用已被遺忘的師徒制，七到十個弟兄們租一間大房子同住，延續神學院式的靈性操練。大約有十個這樣的秘密神學院。但壓力不斷增加，團體逐漸分散。潘霍華成了「巡迴傳道人」，而他的摯友貝特格始終相伴。

II 1938-1940 我是寄居的、異鄉人

1939年1月，詩篇119篇的話抓住潘霍華：「我是在地上作寄居的，求你不要向我隱瞞你的命令。我時常切慕你的典章，甚至心碎。」（19-20）他寫道：「我不可以將心封閉，不關切世上的問題、憂傷與喜樂；我要耐心等待神應許的救贖。」當時他在西格沙夫（Sigurdshof）停留一個月，那是他最後教神學的地方。

徵兵令是讓他內心不安的另一個因素。雖然他決定不參與希特勒的軍隊，但怎樣公開表明才好？他和許多人從1938年夏天就看出，除非納粹政權被推翻，否則全歐洲都會陷入戰爭。他的雙胞胎妹妹因為嫁給猶太人，全家於當年9月逃離德國，到瑞士居住。潘霍華的三哥和姊夫與反抗政府的人士有聯絡，姊夫原是律師，因被查出家族中有非雅利安裔而被革職。

到1940年底，他已靈巧地在教會殘簷和反抗者的虛柱中建構了極狹的窗台，在這小小的據點不倦地傳講福音信息。By the end of 1940, he had deftly fashioned the narrowest ledge on the church's ruined edifice as it leaned against the ghostly pillar of the resistance. From that tight spot, he gave tireless voice to the embattled language of the gospel.

1939年1月30日，希特勒宣佈要消滅「歐洲的猶太人」。3月德軍進入捷克。更多牧者被捕，不少牧者屈從國家。「認信教會運動」瓦解了。潘霍華決定從教會的反抗轉向世俗的反抗；他開始與柏林反抗人士連絡，討論更大膽的計劃。

他在教會方面所作最後的努力，是1939年3月到倫敦去見聖公會的著名學者賀奇森（Leonard Hodgson）。他希望能為「認信教會」在普世教協中爭取一個永久性的位置，但賀奇森卻無法承諾幫忙。

潘霍華認為，歐洲大戰不可免，而他次年即可能被徵召去當兵，所以他決定第二次訪問美國。當時，協和神學院的教授尼布爾很不滿意普世教協，毫無保留地站在「認信教會」一邊，但他更關心德國異議基督徒不斷遭逼迫的事。4月間，尼布爾受邀到英國的愛丁堡大學去演講，潘霍華去英國看他妹妹一家，而與尼布爾相會。尼布爾很擔心他不會被送進集中營，因此設法為他尋覓教席，卻不成功。潘霍華回到柏林不久，5月即收到入伍徵召令。6月，他再度訪問美國。

當時協和神學院正在放暑假，他的朋友都不在，他覺得十分寂寞。他的大哥在芝加哥大學待最後一個月，他們簡短通了電話。他受邀去康乃狄克的友人家小住，但他發現自己對德國無法忘情。回到紐約，他住進曼哈頓的「先知斗室」，忽冷忽熱地寫作，一部分內容似乎在嘗試了解自己。他對美國主流基督教的「自我中心」下了蔑視、嫌惡的結論，認為他們已經失去了改革的精神。不過令他最掙扎的問題是：在逼迫的時刻，應該留下堅守還是逃走。他內心知道，自己至終會選擇前者。



「德國的基督徒必須面對可怕的抉擇，或是願意讓國家戰敗以保存基督徒文明，或願意讓國家勝利而毀掉我們的文明。」他在一封給尼布爾的信中這樣寫。「我知道應該如何選擇，但我不能在安逸裡作這種選擇。……我下了結論，我到美國是一個錯誤。」7月27日，他帶著決心返回德國。

從1939年7月起，潘霍華的行蹤不易追蹤。不過，他的目標只有一個：推翻希特勒政權。

他提出申請，想擔任軍牧，希望至少可以不動武。六個月後他被告知，申請遭拒。

他接受了軍事情報單位的一份差事。他是地下反抗組織的秘密成員，同時還在繼續教導神學生與牧師，因此他到情報局的決定讓認識他的人吃驚，但至少這個工作使他不必加入軍隊，又可繼續與外界連絡。1940年6月5日，他被召到施拉威（Schlawe）入伍處報到。

當時他的哲學困擾為：說實話是什麼意思？1940年6月19日，法國投降，當時他和貝特格在酒吧小酌，所有人都跳躍歡欣，他也隨之起舞，甚至喊出「希特勒萬歲」（Heil Hitler）。事後他向貝特格解釋，未來要偽裝的情況還很多。

身為情報局的成員，他可以用信使身份到英國，趁機把機密資料送給盟國，請他們支持政變行動。而政府則期望借用他在國外的經驗，瞭解美、英、瑞士的政治情況。

他的同僚大部分都不知道他雙重間諜的身份，對他突然在納粹政府工作大為不解。他只能請朋友們對他有耐心，為他禱告，並希望他們不要對他失去信心。

潘霍華在雙重身份的掩護下，向反抗者與合作者都傳講神的話。到1940年底，他已靈巧地在教會殘簷和反抗者的虛柱中建構了極狹的窗台，在這小小的據點不倦地傳講福音信息。

12 1940-1941 廢墟中的聖誕節

1940年12月到次年1月一直風雪交加。潘霍華在小鎮伊塔爾（Ettal）租了一間旅舍，撰寫新書《倫理》（*Ethics*）。北方約一百哩為慕尼黑（Munich），他在那裡定居在姨媽家中。附近的一位天主教律師穆勒（Joseph Muller）成為他與梵蒂岡之間的牽線，請教宗暗中推動同盟國支持德國的反抗組織。

潘霍華一直想離開情報局，他嘗試成為德國文學議會的一員，也試著加入另一個納粹組織「國家社會人民福利會」。這些嘗試都失敗了，不過卻使當局對他的疑心降低一些。前半年，他大多以東普魯士的康尼克斯堡為基地，帶領家庭聚會，同時定期向蓋世太保報到，讓他們知道他不住在柏林。他那年7月已被禁止在德國演講。

在慕尼黑時，他偶爾會去聽音樂會。他買了一百張聖誕卡，寄給所有從前的神學生。他對貝特格戲稱，今年的卡片不妨寫上「廢墟中的聖誕節」。這段時期他所掙扎的問題為：作個沒有教會的牧師

他深信一個基本真理：神以憐憫掌管世界。這是潘霍華一心宣揚的奇特榮耀的福音。 He deeply believed in an essential orthodoxy: God holds the world mercifully in his hands. This was the strange and glorious gospel that Bonhoeffer had taken vows to proclaim.

是什麼意思？怎樣以屬靈的角色參與謀反？如何在教會的廢墟中舉行聖禮？如何對待毫無能力抵抗希特勒的制度化教會？

伊塔爾本篤會修道院的院長克卜弗（Angelus Kupfer）給潘霍華鑰匙，歡迎他到院中使用圖書館。他到伊塔爾五天後，二姊帶著兩個孩子也到這裡躲避轟炸，他負起照顧「義子」的責任。修道院的寧靜與美麗迷住了他，他很樂意參與彌撒，與教士們一起為全球的教會與世界和平禱告。

他每隔一、兩天就會寫信給貝特格，除了生死大事，他也關心貝特格的穿著等瑣事，想把這位鄉下老土變時尚些。貝特格於聖誕節前幾天來到伊塔爾，令他異常興奮。



他偶爾會寫信給從前的學生，效法保羅的教導方式。在旅館裡，他口述，貝特格打字。聖誕節的信息為：神來到我們中間，卻是位外鄉人！多讓人忿怒，覺得受辱！他警告說，德國人不要一位外鄉人作救主。路德曾說，痛苦的自我是蒙恩的先驅；現今這個舉戰之國就像自我囚禁、自我作對的心，需要恩典。

潘霍華一方面宣講福音的真理，一方面思考基督教可能結束；一方面計劃暗殺希特勒，一方面肯定和平主義倫理；一方面歡慶婚姻聖理，一方面又將自己的感情專注在一位弟兄身上。時局在他身上造成他信仰的複雜與矛盾。然而他深信一個基本真理：神以憐憫掌管世界。這是潘霍華一心宣揚的奇特榮耀的福音——儘管大部分世界看不出「好消息」的證據在哪裡。有時，福音只能以微聲低語傳出，而迴音則在黑暗中，來自焦慮的中央。

以後兩年，潘霍華的書信常以陰暗悲哀的話開頭，為死在前線的勇士寫輓歌。面對現實的噩夢，他精心打造的神義論為：戰爭是為恩典作準備。他用這個信息安慰從軍的人，特別是無法忍受殘酷殺戮的人。

潘霍華告訴貝特格，他的手稿可以取名《預備道路》與《抵達》，或簡稱《倫理》，內容既冒險又刺激。當時他在看的幾本書為：《最後的清教徒》、《權力與恩典》、《這在一切之上》等。2月他滿35歲。貝特格離開後，他又專心寫作，推敲

「倒數第二與最終極的事」，為「自然與身體生命」辯護，反對納粹制定的安樂死與優生學。

情勢愈來愈緊。修道院的學生陸續被徵兵，學校必須關閉。他所熟悉的弟兄當中，死亡與被捕的人數一天天增加，還有精神崩潰與自殺的。他的父母也承受極大的壓力。他決定不抗拒徵兵，主要是為了家人和朋友。1940年10月，他獲得情報局具國家安全的UK（不可少）地位，所以不必入伍。直到1943年2月被捕前，他一直保住UK地位。

貝特格雖是潘霍華的良伴，但他本人對這份情誼顯然並不那麼全然投入，只把潘霍華當作「可以無時無刻放心請教的人」。潘霍華則常覺得，他若缺了貝特格就不完整。貝特格覺得自己無法滿足潘霍華的感情要求，為此而頗有歉意。

1941年2月24日，潘霍華終於獲准出國，到了瑞士。這是他第一次真正為謀反的陰謀出任務。他設法與先前的國際友人聯絡。離開瑞士後的幾個月，他行程滿檔，不斷旅行。這樣的日子使他更加感到人生變化莫測，而產生即時享受的心態。他打造了「內心正死」（inner dying）的藝術，從新的視野來看永恆，覺得自己可以自由地進入世界；他感到在恩典中他內心有持續的喜樂和蒙福的寧靜。「基督徒不是要從地上的任務與困難逃出，進到永恆，而是像基督一樣（「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要喝盡地上苦杯的渣子。」

1941年夏天，他的二姊夫要秘密送七個猶太人到瑞士，後來增至十四人。潘霍華在其中幫忙取得簽證和擔保人。這計劃9月成功執行。他們想嘗試第二次，卻未能實現。

13 1941-1943 殺那瘋子

自從1935年孩子們都離家之後，潘霍華的父母便搬到沙樂頓堡（Charlottenburg）。1941年9月底，潘霍華和貝特格從瑞士回來，又住進父母家的二樓。蓋世太保禁止他的書出版，他則以殷勤寫作來回應。10月16日，第一批猶太人被移送。三週內，六萬猶太人從柏林火車站被送到波蘭的集中營，大部分人後來死在那裡。未來三年半還有63次移送。

10月，潘霍華和佩瑞斯（Friedrich Justus Perels）律師合寫報告，發給他的二姊夫，讓反抗軍領袖貝克（Ludwig Beck）瞭解納粹的暴行，也送了一份到日內瓦（普世教協與全球基督徒大會的總部所在地）。11月，潘霍華寫了一封信給各地「芬肯華德」的校友，告知有兩位畢業

4月4日晚上，他在自己家裡被捕。時年37歲。
On the evening of April 4, 1943, he was arrested in his home at the age of 37.

生在前線喪生。12月初，他到基克（Kiedkow）的友人家繼續寫《倫理》；聖誕節則回柏林度過。1942年年初和以後的牧者信，不斷傳出校友死亡或失蹤的消息。

1月20日，納粹高層在宛西（Grosser Wannsee）決定「最終處理猶太問題」的方案。（1943年聖誕節前，集中營六百萬人中的75%被處死）。三天之後，潘霍華與一些反抗組織人士在芬耐舍旅館（Venetia Hotel）相會。柏林的反抗組織目標集中在刺殺希特勒。潘霍華的角色仍較像牧者：為這些人和他們的計劃禱告，並在道義上支持他們。

春天時，他去了一趟瑞士，其間又秘密到瑞典的希革通納（Sigtuna）去見一些世界教會領袖，特別單獨與英國主教貝爾深談，希望他轉告邱吉爾，支持德國的反抗組織。但這要求並未獲回應。不過，這次會面促成地下組織的牽線，在1943年9月使得7400位挪威與丹麥的猶太人獲救。

1942年夏天，潘霍華繼續在家裡寫《倫理》書稿，他提到：順服神，是無條件、全然用信心踏入未知。6月，他到義大利兩週，內容不詳。這個月他亦去探望從前支持神學院的克萊利周女士，他們六年未見；在她家，他與她的孫女馬利亞·威德梅爾（Maria Wedemeyer）重逢，發現這位16歲的妙齡少女長得很像自己的雙胞胎妹妹，不覺心動。11月，他再去拜訪這個家庭，因馬利亞的哥哥喪生在戰場，他以牧師的身份去安慰他們。

這段時間，33歲的貝特格開始與潘霍華17歲的侄女交往，一年後兩人訂婚。而1943年1月，潘霍華則宣佈與馬利亞訂婚，讓雙方家人

都吃驚不已。女方家人起初下隔離令，但後來容許他們通信與相見。一位友人回憶，直到潘霍華被捕後，周遭的人才慢慢視他們為未婚夫婦。

1942年11月間，潘霍華曾與一些反抗組織的弟兄見面。一位有機會接近希特勒的弟兄問他：「我

可以開槍嗎？」潘霍華說，他不能替他作決定；這樣作，在道德上也不可能無罪；然而，基督已擔當了我們的罪——這永遠是我們的安慰。



1943年1月，他寫信給親密的反抗弟兄，後來這封信被取名：「十年之後：1943新年思想」，他問道「我們還有用嗎？」「我們」是指良心、國際菁英、教會的孩子。他有新的想法。「罪惡的龐大化妝舞會把所有倫理概念都弄亂了。」「誰能站穩？只有那些終極標準不是自己的理性、原則、良心、自由、或美德的人，只有那些預備好犧牲這一切的人，單單在信心和與神的關係裡，蒙召去順服，並作出負責任的行動人才能。這樣的人是負責任的人，他的生命只向神的提問與呼召作出回應。」「留給我們的是極窄的路，有時無法分辨；每天這樣走，好像過最後一天，但要忠心與負責，就像仍有偉大的未來。」

1943年2月18日，德國宣傳部長宣告全面戰爭。潘霍華捲入反抗組織直到3月13日。4月4日晚上，他在自己家裡被捕。時年37歲。對他而言，神的國是屬於行動者的；面對希特勒的殘暴，只能以暴力回應。

14 1943-1945 自由路上最大的筵席

潘霍華被關進監獄，48小時後才拿回被徹底搜查過的聖經。第一週的末了，他就被移到最上層的單獨監房，不准有書、報、菸，也不可以寫信。以後12天，他戴著手銬腳鐐，獄門只在送食物與便壺時打開。半小時的放封也不允許。晚上其他監房常傳來低泣聲，這些獄友便成了他的新會眾。他晝夜為他們禱告，祝福。他獲准能有紙筆後，常寫下禱告詞，寄給他父母，請他們轉寄給入獄者。

頭幾週很難熬，他感到孤獨囚禁好像「我已經死了」，自殺顯得不再是罪，而是抗議的光榮行動。4月14日，他可以寫信了，第一封信是寫給父母，報告自己尚好。以後每十天，他寫信給父母和大哥。他說，監獄是「靈魂的蒸汽浴」。他「晚上八點睡到隔天六點，睡眠充足，……不再想抽菸，……一切物質需要顯得毫不重要。我發現這是讓我生命豐富的經驗。」

以後他遷到三樓較大的監房，可以看到獄外的松林。在這裡，潘霍華住了18個月。他可以從監獄圖書館借書，也有半小時放封。清晨與晚上，他偶而會唱幾句詩歌。空襲警報時，他會被轉到二樓，從那裡可以看見教堂的尖塔，他感到「很美」。

但他不知道父母的痛苦。他的二姊4月被捕，兩週後被釋放；二姊夫則被抓進看守所。母親多次昏厥，陷入憂鬱症。不過他寫信請求父母原諒他帶來的憂傷。他開始研究「時間的感受」。每天七點

有人目睹他「跪下熱切向神禱告」，在踏上台階前又作了一次簡短的禱告。幾秒鐘後，他便喪生。 An eye-witness said that he "bowed to his knees and prayed fervently to God"; again, at the place of execution, he spoke a short prayer. His death ensued after a few seconds.

到中午是他寫作的時間，下午讀書，「可以學的東西很多」。他的家信幾乎沒有怨言，偶而會請家人送些衣物。

他在寫給貝特格的信中比較會吐露真心話，然而直到11月18日，他給這位好友的第一封信才得以寄出。本來他只能寫信給家人，但一位同情他的士兵幫他和貝特格轉信。

1943年9月貝特格入伍，被派到義大利，他任職文書，不必作戰。潘霍華在獄中常幻想晚上貝特格在身旁與他對話；他曾說「不管我寫過什麼，這裡其實糟透了」，有時他晚上會有可怕的想法，只能不斷「藉詩歌」來驅除。有時他的念頭太黑暗，甚至不能與貝特格分享。

潘霍華直到被處死之前，一直沒有停筆：信、詩、禱告、小說稿、戲劇、故事、未來書稿的大綱、格言、解經，談到各種話題。他不同意他在獄中是受苦。「這裡很糟，但別的地方難道不是一樣？」「受苦應該是很不同的，與我現在所經歷的是不同的層次。」

柏林的特格爾（Tegel）監獄關了七百人。當獄卒發現潘霍華的父親與親戚是德國的知名教授、將軍，他便受到禮遇。有時，典獄長還會來陪他散步，也讓家人送東西來；有一次他的叔父來看他，和他聊了五個小時。他會利用自己的這種身份，要



求獄政作些改善。後來他在牢房一天至少要待14小時，而他大量要求獄方提供哲學、科學、藝術、政治理論、歷史、文學等書。至於神學書籍，他只讀巴特的新著《教會教義二》，其中對於神的愛的詮釋，潘霍華在獄中所寫的書簡曾大量引用。

1943年7月，潘霍華終於被告知他的兩項罪名：逃避兵役，並幫助別人逃避——「看來有罪」、「在柏林和其他地方有嫌疑」。罪狀上還列舉其他與「認信教會」有關的活動，但皆與反抗組織無關。然而這兩項罪名已可判處死刑。幸好在9月的審判中，罪證不足，他躲過一次危機。他期待1943


年的聖誕節或新年可與家人團聚，但未能如願。

他的信件開始流露大量戀舊情懷，也寄情於掉落的小花、美麗的椴樹等細節。他寫給未婚妻的信像父親寫給女兒，有很多勸勉。而他想到婚姻，常與責任、義務、必要、法律相連，認為這是因原罪而來不得已的安排。至於他和貝特格的友情，則被他更加理想化。1944年8月28日，他為貝特格35歲的生日寫了一首詩：「朋友」，描述他們之間的愛「在寬闊的天空」長存，不是「出於沈重、屬地的東西」。不過，由於他期待自己會被釋放，所以對婚姻仍然很認真，與馬利亞談到不少細節。

1944年7月20日，反抗組織刺殺希特勒的行動失敗，連帶被捕的達到五千人，潘霍華全無出獄的希望了。他在獄中還想寫一本新書，用基督教的寶藏來因應未來的新世紀，暫時取名為《一本書的大綱》。他指出，神不是形上學的假設，而是「與耶穌基督相遇」；基督徒乃是參與耶穌的故事；教會是四面向世界敞開的架構；接待、饒恕、和好是基督徒要專注的。現有的基督教團體必須重新改造，教會要放棄所有財產，牧師不再受薪，教牧人員也要在社會中工作服事。（注：針對德國的國家教會模式）

潘霍華曾計劃逃獄，但為了父母而決定放棄。10月間，他的三哥、貝特格和一些好友也紛紛被捕。他被轉到司特拉斯（Prinz-Albrecht-Strasse）的納粹監獄，那裡的審訊極其殘酷無情。聖誕節時，潘霍華已經確知他的命運，在信中開始交待後事，並感謝朋友。他也曾與獄友一起唱「神是我們的堅固保障」。他給家人的聖誕禮物是一首詩：「來自一切良善的能力」。在如同地獄般的監獄裡，潘霍華感到有天使到訪，那「偉大不可見的範疇」如今成為可見，因此再無須懷疑其存在。他在世並無遺憾，但他不想被人遺忘。在夏天給貝特格的一封信中，他曾寫道：「我要把自己的生命拿回來。我的過去。你！」

1945年2月7日，潘霍華被移送，最後到達捷克邊界的弗洛森堡（Flossenbürg）集中營。4月8日晚上，在一次秘密審訊中，潘霍華很快被定死罪；第二天早上，他與另外五位囚犯被脫光衣服，送上絞刑台。有人目睹他「跪下熱切向神禱告」，在踏上台階前又作了一次簡短的禱告。幾秒鐘後，他便喪生。他的屍體下落不明。

4月23日，盟軍解放了該集中營，發現積屍堆疊。4月28日，貝特格被釋放。 

我所羨慕的服事

劉陽



今年5月裡正式結束了三年半的神學院學習，時間剛好，既沒有長到讓人忘記起初的呼召，也不至於短到以為憑著自己就可以大幹一場。畢業典禮那天，跪在台下被眾牧者在禱告中差遣時，一股熱流傾注在胸腹之間。我這樣的人，竟然可以被當作神的僕人差遣！

感謝神的呼召，使我能夠進入神學院裝備自己，也感謝神讓我可以身處恩福這個大家庭裡，與諸多師友彼此溫暖砥礪。

徹底清理自己的幾年

回首這段日子，除了要完成基本的課業要求，還有機會近距離觀摩有生命流露的師長、實際進入華人教會實習操練，對我都非常有助益。但神最奇妙的恩典，是藉著這幾年，使已入中年、在既定軌道中生活工作服事的我，忽然有了一大段時間，容許神施行拔出、拆毀與建造、栽植的工程，集中對付自己生命中潛藏的傷口和問題，更徹底地清理自己。

如果這幾年我還要每日為生計憂慮，想必很影響這過程的效果。回想當年得知華人世界有恩福這樣有遠見的機構，專門資助對文化和傳媒領域有負擔的神學生，實在是驚喜。

婚姻是最好的神學院。剛入學時，大兒子才五個月，兩年前又添了個女兒。我最被同學熟悉的形像，就是一手拿著原文單詞卡，一邊在院子裡帶孩子的樣子。在與孩子的日日相磨中，讓我更深認識到自己本性的敗壞；在孩子身上，也看到我自己原本就有的罪的影子。若不經過這些，我對自己的認識可能還在雲裡霧裡，對自己的罪還會百般推諉，上多少靈修課也意識不到，聽妻子的直言也不肯承認。

說到這，我要承認，在婚姻這神學院中，妻子沈穎實在是我最寶貴的同窗。在我的每一處傷口，

都撒滿她流淚的禱告。我知道，她愛我，卻恨我身上的罪——儘管有時，我希望她連我的罪也一起愛，那樣我就可以免受面質之痛！婚姻是福音的奧秘，我們仍在揣摩與磨合之中。

畢業之際，我對神學院的定義就是：只有在這個學校裡，宿舍生活比課堂表現更重要。這個理解徹底幫助我打掉了之前憑恩賜服事的驕傲，老老實實地承認，我能夠進入神學院讀書、能夠畢業並即將進入教會服事，完全是神的恩典。

作為一個被主找到的病人，某種程度上講，我是把學校當作醫院來辦理入院手續的。如果不得醫治，我根本不可能有任何持續且有果效的服事可言。據我的了解和觀察，這也是許多神學生的光景。而更尖銳地說，在這個世代，神除了病人其實無人可用，甚至也只有病人才肯獻上自己為主所用。神的恩典就在於：我獻上自己的殘破，祂竟然賜我日益康健和豐盛，使我成為可用。

舞台內外的觀摩

除了老師的傳講之外，神經常使用圖書館的藏書，引領、牧養我們全家。當我們面臨問題，無論是事工還是教養子女方面，或個人生命中遇到的某個問題，去圖書館轉轉，每次都會“恰好”借到一兩本非常具有針對性的書，一位師傅就這樣站在我的面前。我體會到，原來神是可以通過圖書館帶領人的。

此外，學校、教會、洛杉磯、美國……一個個舞台，層層疊疊，就像聖經裡說的“一台戲”，各類人都有機會展示自己。而我們以為的台下生活，卻是神與天使重點觀看的舞台。舞台內外，看不見的與看得見的因素交彙其中。或參與或旁觀，都幫助我體會神的旨意如何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看到神的國如何透過人的順服來拓展；我也看到神的

通過事奉，首先我自己的生命因此而被不斷對付，被十字架破碎，被寶血潔淨，更多與主連接；在這個過程的同時，我不斷將自己的得著分享出來。 Through service I would like to see my own life being constantly dealt with, crushed by the cross, cleansed by the precious blood, and walking closely with the Lord. Meanwhile, I would share these experiences with others.

心意如何被人意攔阻，魔鬼如何抓住人不肯對付的小小軟弱，敗壞敬拜的舞台效果。我和妻子的確遇到了非常寶貴的生命榜樣，絕不僅限於台上的名人，而是在默默無聲之處帶著十架馨香的生命。

北美的環境幫助我開闊了屬靈的視野和分辨力，尤其是接觸到一些美國基督徒，他們的文化被信仰更新的程度，讓我不得不反思，自己作為華人何以不求甚解、得過且過、自以為義、狹隘刻薄。在北美這幾年，恰好讓我看到許多老一輩牧者進入服事主50年的時間點，許多機構和教會也都步入成立20年左右的光景。旁觀揣摩，幾多榜樣、幾多唏噓。

幾年浮光掠影的觀察之後，我才更覺得恩福的寶貴。陳牧師與師母二十餘年來單單因為摸到主的心意，看到主在末世的排兵佈陣裡需要這樣一個戰略據點，就夫婦相攜並肩站在有時未免孤獨的守望台上，不計回報、不攬名聲，把自己的資源、心力掰碎了，放在一個又一個像我一樣的被扶助者生命當中，做我們天路歷程中這一程的踏腳石。

這個世代，需要真正有國度胸懷的牧者，在主面前抱一顆單純的心，肯付代價做成人之美的事，促成神在人身上的目的而不附帶其餘。這樣的服事，就是我所羨慕的服事。

面對未來的期許

我和妻子在就讀期間開始了一項名為《境界》的新媒體事工，神感動一些同學和牧者來與我們同工，我們在學校的信箱裡三次收到不具名的奉獻。兩年多來，參與服事的都是義工。神在全球範圍內以異象凝聚人、呼召人，並幫助同工們建立屬靈的聯結，察驗我們服事的心志。相信未來神必定會繼續使用這樣的團隊。

我希望自己在生命的對付上能夠勇敢而堅持。對於十字架生命的操練，無論在家中還是面對周圍的人，我才剛剛開始。求主幫助我堅定走在這條屬靈的路徑上，不自愛自憐，不換道、不調頭。當我軟弱想要放棄時，求主牢牢抓住我，不放棄我！我也希望自己能在神話語的掌握上更扎實，一卷書一卷書地深入進去；同時不斷經歷聖靈的大能。

畢業前的一份作業要求我描述神僕人應具備的品格以及我眼中的成功服事。我大致列了如下幾項僕人的品格：

受苦：以為主受苦為配得、為福氣，“你們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並要為祂受苦”，“你們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這在神



看是可喜愛的。你們蒙召原始為此，因基督也為你們受過苦，給你們留下榜樣，叫你們跟隨祂的腳蹤行”。

順服：不是一次順服終生有效，而是不斷順服，以往積累的屬靈資本不成為繼續順服神的攔阻；

求真：神比任何人都喜愛真實；“祂憑真實將公理傳開”；

悔改：傳悔改之道，自己要常常悔改，要不斷給自己傳福音……

至於我所羨慕的服事，或者說，我希望自己能夠做到的服事是：

此生不斷經歷神改變生命的大能，首先是自己的生命，而後自然也能影響他人的生命；通過事奉，首先我自己的生命因此而被不斷對付，被十字架破碎，被寶血潔淨，更多與主連接；在這個過程的同時，我不斷將自己的得著分享出來，通過各種方式無論講台還是媒體。我希望自己的服事能夠證明，我沒有忘記自己是一個蒙恩的罪人，在撒但的網羅中被主保守，願意回頭堅固我的弟兄，願意回應主捨命的愛，不再任意而行，寧願為主被束上帶子，以餘生回答我的主：是的，我愛你。

梅頓說，一棵樹站在那裡就是在敬拜主。我想，至終，如果一個（最）不可能服事神的人竟被神管教、熬煉、改變以至於可以服事祂，就是這個人所能獻上的敬拜。

寫下上面這些話，心中仍有激動，因為不是我已經做到的。人在復述已經完成和經歷到的事情時，大抵是平靜的；在敘述夢想時，卻難免激動。

求主成全，奉耶穌的名。✠

作者今年畢業於正道神學院

(接封底)

新絲綢路的大夢

古代，西方與東方只能遙遙相望。北方隔著高山峻嶺與無邊沙漠，南方有大洋險阻。唯一將兩端相繫的，是纖細、冗長的絲綢之路。途中留下的千年斑斑遺跡，訴說著古人如何因著美麗的憧憬，排除萬難，踏上冒險的旅程。

如今新的絲綢之路，何嘗不同樣起源於對美夢的追逐！

2013年11月，中國執政者將「一帶一路」釐定為國家經濟戰略，要與沿途六十多個國家共同攜手，邁向繁榮。這個跨國合作的宏偉構想雄心萬丈，不僅要成就「中國夢」，實現「亞洲夢」，還要更新「世界夢」。

從那時起，順著這個理想頻頻出招的舉動，不時成為報章頭條。以2015年為例，博鰲亞洲論壇3月底的年度大會，規模遠超越以往；以北京為總部的亞投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4月確定有五大洲57國作創始成員國，勢必導致國際金融秩序大洗牌；4月中旬，「中巴合作協議」簽訂，中國將在巴基斯坦投資460億美元，興建中巴經濟走廊，作為「一帶一路」的啓航。

在這條新經濟帶上，未來必定不斷有新的行動。據聞，全國各省無不磨拳擦掌，提出計劃，搶搭「一帶一路」列車。相關的股市更切望出現爆發式增長。

有人盛讚，這項規劃一舉三得。一來可把中國嚴重過剩的水泥、鋼鐵等產能輸出；二來可藉交通與通信網的建立，營造區域新格局；三來可建立中國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可謂「一子落而滿盤活」。還有專家評價，這是中國五千年治理觀念改變的分水嶺。過去中國持「修文德以來天下」，目光只放在自我的完善。然而，藉著「一帶一路」，中國將主動走出去，積極影響其他發展中國家。

宣教願景的路線

關心宣教的人，對於「絲綢之路」並不陌生。早年，勇敢的福音使者便是藉由此道，前往中土。唐朝時，景教徒循著北線將福音帶到長安；明朝時，天主教耶穌會教士循著南線再度向神州叩門。

上個世紀40年代，中國教會仍然弱小，然而有些人得到福音遍傳的異象，認為神要他們向西進，經由最艱難的地帶，將福音傳回耶路撒冷。1943年，以陝西的西北聖經學院為班底的「遍傳福音團」成立；1946年，以山東樂道靈修院為主幹的「西北靈工團」成立。他們差派短期、長期的宣教士，前往中國的西疆各省，努力佈道，建立教會。1950年後政局改變，不少同工為福音下監，甚至殉道。

當年這批宣教士大多受過高等教育，具專業能力，並且立志憑信心承擔大使命。他們所寫下的詩歌、見證、拓荒心聲，激勵了許多內地的信徒。改革開放後各地教會新興，靈工團碩果僅存的老宣教士巡迴見證，生命感染生命，同樣的呼召臨及了新生代。

中國西疆直到耶路撒冷的廣袤區域，可謂福音所遇最堅硬的土地之一。關注普世宣教的人士



一般同意，沿線的人對亞裔的接納度較白人為高；而經過苦難歷練的華人信徒，較能承擔這項任務。有些中國教會從未停止為這異象訓練下一代。2008年舉辦的「從西安到錫安」之旅，有

數十位城市教會領袖參加。2011年8月，「渴想歸回耶路撒冷的兩代人」會議在西安召開，參與者顯示出極大的熱情與委身。

鑒於對「傳回耶路撒冷運動」，教會界有不同的看法，針對這問題作博士論文研究的一位牧者提出他的見解：

「……中國教會的歸回耶路撒冷異象是合乎聖經的。聖經具有以耶路撒冷為中心的宣教異象。……宣教運動是以錫安為中心抵達地極，向列國傳揚基督福音的運動。中國教會不但要朝向耶路撒冷，亦須走向一切尚未聽到福音的地區與民族，且與他們一同歸回耶路撒冷。」¹

路線重疊的聯想

無巧不巧，教會渴望推進的宣教路線，如今竟與「一帶一路」的規劃重疊。這讓關心宣教的人不禁聯想：莫非神的手在其中，要加速這一地區福音的進展？

懷著「傳到地極、傳回耶路撒冷」異象的中國宣教先驅們，因著政局未得再往前行，只能忠心地將生命與鮮血灑於西疆。今天，是否華人宣教士可以搭上「一帶一路」的快車，事半功倍地跑下一棒？

宣教願景不應屬於少數人。身為華人基督徒的我們，面對新絲綢路的機會，怎能不為主的大使命再度獻身？

註：1. 本段參考金明日牧師博士論文《萬國歸向耶路撒冷》，待出版。

恩福

The Blessings Foundation, Inc.
Blessings Cultural Mission Fellowship
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U.S.A.
地址變更，請即通知本刊，謝謝！

NON-PROFIT ORG.
U.S. POSTAGE
PAID
SANTA ANA
CA
PERMIT NO.450

新絲綢路與宣教願景

蘇卿

「絲綢之路」，曾經是遙遠的歷史名詞，如夢似幻。
即使在近代旅遊業的大戲碼中，它亦不常擔當大綱；頂多跑跑龍套。

不料這兩年它竟搖身一變，披上嶄新戲服，躍登世界舞台，成了鎂光燈的焦點！這套華麗的新裝，長袖揮北舞南，為全球地圖添加兩道鮮艷的色彩。

簡稱「一帶一路」的新絲綢路（BAR [Belt and Road]，或OBOAR [One Belt and One Road]，OBOR），北線（「絲綢之路經濟帶」）從西安跨越高原峽谷，穿越沙漠盆地，深入中亞腹地，通連歐洲。南線（「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從中國東南沿馬六甲海峽，過印度洋，直抵大西洋岸邊。

（轉封底裡）